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6 年 5 月 30 日第 69 期

本期目录

【“二月镇反”专辑】

热点研究

- 徐友渔 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
孙言诚 “二月镇反”与青海“二二三”事件
何 蜀 “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

故纸堆

- 渔歌子 选编 有关重庆“二月镇反”第一案“前哨支队”案的三篇资料
 《新重庆报》关于镇压“前哨支队”的报道
 《新重庆报》关于镇压“前哨支队”的社论
 反到底派对“前哨支队”案的调查报告
渔歌子 录入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
渔歌子 摘录 山东“二月黑风”中抓人情况
罗成胜 录入 涪陵军分区为“二月镇反”受害者发布的平反公告

书海泛舟

- 叶曙明 军队严厉打击造反派组织（《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
 选读）

【“二月镇反”专辑】说明

文化大革命，在中共执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是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了十年），而在整个文革大运动中，还在不同阶段开展了不同名目的小运动。按照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的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十六条”公布后的“破四旧”

抄家遣返、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小运动，却完全转移了“大方向”，以下层民众里的“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为打击重点。发生在1967年春的“二月镇反”，也是这类转移“大方向”的小运动中的一个，而且是非常明确地以造反派为打击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对这样一次大规模打击造反派的运动，在官方史著中却基本上不见提及，学界也很少有专门研究。本刊特编发这一专辑，望能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热点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

徐友渔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发表于《领导者》总第68期（2016年2月出版），发表时因篇幅所限，删掉了全部注释。现本刊发表的是作者提供的完整版。

1967年2月，中国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到高潮，形势突然发生逆转，由“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变成了“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组织”，“人民的盛大节日”转瞬成为逮捕和专政的恐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的“镇反”运动中，数十万人被抓捕，数千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反动”或“右派”组织，被牵涉到的群众（被迫请罪、宣布退出、被通缉、游街、批判斗争）高达数百万。

许多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二月镇反”至今记忆犹新，一些文革亲历者在回忆录中对此有所提及，但奇怪的是，在不论中外、卷帙浩繁的有关文革史的正式出版物中，很少看到这方面的记载；在研究文革的各种论著中，也很难发现有关介绍与评论。2007年10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书评，在赞扬由郭建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英文，*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2006）的同时，建议补充词条“二月镇反”，词典编者从善如流，接受了我的意见，并在新版中增设此条。当然，全面、深入、详细研究那段历史仍属必需，“二月镇反”涉及人数众多、地区广大、时间不短（集中在2月，但起迄时间是1至4月甚至到5月）、事态严重、情节陡变具有戏剧性，卷入者包括从最高领导到最基层群众各级，尤其是由军队担任主角，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也是文革记录和研究不可忽视的重大题目。

本论文尝试对“二月镇反”作初步描述与分析。由于作者资料不完备、经历与能力有限，文中的说明、概括和评论难免不当，祈望方家指正。

“二月镇反”的典型案例：四川

四川的“二月镇反”有两个明显的导火索，一是“一·二九事件”，二是成都军区抓捕军内造反派。

1967年1月29日，四川首府成都市激进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或“工人造反兵团”）属下的街道工业分团进入成都市公安局，声称去“造反”和“收查黑材料”。此分团平时造反激进，其组成成分（“街道工业”的从业者在当时一般被视为政治面貌可疑、社会地位低下）和行动常引起正统思想者的非议，此举引起激烈的反弹，成都军区和成都市公安局内当权的那派将事件定性为“抢劫市公安局的反革命事件”，派出部队和公安人员在1月30日包围街道工业分团，逮捕其首领宋立本、黄全章等7人。

2月11日，成都军区抓捕机关内部的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红色造反军等造反派30余人，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空字028部队等军事单位的造反派30余人。这激起了社会上相同派别造反派的愤怒，为了声援战友，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等组织到军区门口要领导接见，遭到拒绝，于是开始静坐示威。之后，在相同观点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声援和参与下，静坐军区的活动愈演愈烈，成都军区大门口及其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口号声此伏彼起，整日不断。2月12日，成都军区领导发布《成都部队紧急公告》，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等等。同时，成都军区党委还发表声明，表态说刚刚被造反派打垮的、被说成是保守派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不是保皇组织。

2月17日，成都军区散发《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预。”还说，“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份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份是革命师生组成的。”最后警告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成都军区用飞机在全省范围内散发80万份“二·一七信件”的传单，另外，还由省公安厅发布《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印制26万份张贴全省。这段时间，人们看到的是天上撒传单的飞机，地上奔驰着发出尖

利警笛声的警车，监狱人满为患，以至于需要临时把寺庙改为看守所。大街上不断走过被游街示众的“坏头头”，以及请罪的群众组织队伍。“兵团”、“八·二六”、“红卫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等组织被禁止进行活动，主要头头被抓捕。“镇反运动”不仅发生在成都，而且波及外地各专县。到3月底为止，全省拘捕了25000余人，这只是极不完全的统计，而变相的拘留人数远远超过此数，被明令取缔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多达600余个。

四川的“镇反运动”搞到接近3月底，3月26日，军委通知各地公安部门，暂停抓人。¹

之所以把四川作为“二月镇反”的范型，是因为它完整地包含了以下元素：一、2月之前造反派（或其中的激进派）的活动非常激烈，激怒了军方；二、发生了军内造反派被抓事件，使得社会上的造反派大力声援，甚至冲击军区；三、有来自中央一级的命令或表态，使得军区镇压时手持尚方宝剑；四、在2月之前，造反派已经分裂为严重对立的激进派与温和派，温和派一般没有参与攻击军区的行动，因此在镇反中未受压制或不是主要目标，温和派甚至有支持和协助镇压的行动；五、之前被造反派打垮的所谓保守派组织在“镇反运动”中复活，成为军区的依靠力量，并被军区宣布为“革命左派”组织，而随着“二月镇反”被中央宣布为“复辟逆流”，它们也彻底失败；六、“二月镇反”被当做“复辟逆流”被否定与反击，实施镇压的军区被中央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受镇压的造反派被中央肯定为革命左派，而未受镇压或支持镇压的造反派位居次席。其他地区的“二月镇反”不一定全部具备这些元素，特别是第三点。

四川另一大城市重庆当时还不是直辖市，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其地位和重要性不在成都之下，而运动的剧烈程度则在成都之上。重庆在1967年2月也发生了当地驻军镇压造反派中激进一派的“镇反运动”，但因为重庆造反派主流力量态度温和，与军队的关系良好，所以“镇反”的震动似乎比不上成都，据事后的统计，重庆市共拘捕2000多人，取缔群众组织700多个。²

全国概况

在当时的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有少部分地区没有发生“镇反”

¹关于四川的“二月镇反”，参见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合编：“四川二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大事记”，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10年，“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部分，第15条，1967.06.00；成都革命造反编辑部汇编、整理：“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出处同上，第19条，1967.07.00；东方红八·二六战斗队机关报“八·二六炮声”编辑部等编：《八·二六文选》，1968年，第105—239页。

²关于重庆的“镇反”，参见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溪流出版社，美国，2006年，第79—81页；何蜀：《为毛主席而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香港，2010年，第140—151页；李木森：《亲历重庆大武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5—48页。

活动，它们是：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贵州、山西以及其他几个省份。

北京没有“二月镇反”很好理解，这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在地，造反派完全听命于文革派，军队在天子脚下丝毫没有自作主张的余地，不能设想在北京发生与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相反的“镇反”，除非发生了军事政变。

上海的情况与北京类似，张春桥、姚文元两员文革派大将掌控局势，听命于他们的造反派占据主流，当地部队不作他想，不存在造反派与军队的冲突，上海早早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成为“一月风暴”中胜利夺权的样板。

黑龙江、山东、贵州、山西是文革形势大好的省份，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批革命委员会。在这些省份，都反常地出现了大力支持造反派的重要领导干部（包括军队领导干部），他们与造反派、当地驻军相结合（哪怕是暂时地），压制其他派别和势力，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委会。不过，即使是在山东这样的“先进省份”，在1967年3月以来，省军区也在有些地区和单位的支左工作中犯“方向、路线错误”，取缔造反派组织，抓捕其成员，只不过军区的检讨、平反、释放工作做得好，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要注意，“二月镇反”有特定的含义，并非任何发生在1967年2月军队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行动都属于“二月镇反”的范畴。如果对“二月镇反”下一个精确的定义颇为困难的话，那么用前面叙述四川案例时提出的几个元素作为标准进行大致判断是可以的。在山西太原，2月13日、16日、23日，在太原航空仪表厂、太原钢厂、太原铁路分局分别发生反夺权事件，三单位的工人兵团太行司令部、工人兵团太钢联合总部、工人兵团铁路红旗被军队镇压，¹但这些事件属于夺权浪潮中的派性冲突问题，并不影响“山西省没有发生二月镇反”这个总体判断。

我们来看看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况，本论文的篇幅不允许作全面、详细的描述，我们力图刻画出不同地区的特点。

青海。成为军队镇压造反派的典型，“青海八·一八”接管《青海日报》社，与部队发生对立，2月23日，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对青海“八·一八”等造反派开枪，打死打伤300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二三惨案”，另外还逮捕近万人。

福建。在1月下旬和2月上旬发生造反派冲击福州军区的“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军区将其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进行镇压和逮捕。共抓捕和拘留2000多人，取缔、解散组织80多个。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军区释放被逮捕的人，对被打成反革命的个人和组织平反。

内蒙古。1967年1月下旬，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争夺《内蒙古日报》时，军

¹石名岗执笔：《文革在山西》，电子版，第86—87页。

区支持保守派，之后抓捕军内造反派，围殴冲击军区的本地造反派和外地学生；从2月中旬到3月初，在保守派的配合下，在呼和浩特市和其他地方，大量攻打、抓捕和殴打造反派和其他群众。在4月发布的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中，中央定性内蒙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造反派，大批逮捕革命群众，并决定变动军区领导。在军人的抵制下，新任领导人竟不能上任，数千官兵还跑到北京去闹事。直到6月，在一系列严厉措施（处分带头对抗的军官、另调军队入驻呼市、改变军区规制等）之后，内蒙的文革才走上中央指定的轨道。¹

湖南。在1967年的“一月夺权风暴”中，湖南省军区支持较为温和的造反派“高司”，压制较为激进的造反派“湘江风雷”。该省的特殊之处在于，省军区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四”批示对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实施镇压，另一激进造反派组织“湖南红旗军”被镇压，则有1月20日中央军委的批示。两组织支队长以上头目绝大多数被捕，据说，长沙的监狱人满为患，各影剧院甚至教堂都成了临时拘留所。直到1967年8月10日，中央才发文为“湘江风雷”平反，称其为“革命群众组织”。毛泽东在平反文件中委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匆匆忙忙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1967年“二月镇反”中文革派中央主张镇压造反派，这是例外的一次。

湖北。2月中旬，解放军武汉部队发表声明，矛头指向军内造反派，对造反派施加压力；下旬，抓捕、管制、批斗军内造反派，3月中下旬，大肆宣布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全省抓捕数千人，保守派乘机复活，支持和配合军队镇压。4月初反击“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开始放人。军队不顾文革派中央的招呼，坚持原来立场，因此在全国反击“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依然受压，直至“七二〇”事件爆发。²

广东。因为比其他地方晚一些，广东发生的事件在当地叫“三月镇压”而不是“二月镇反”。1月28日，军内造反派到军区去追查黑材料，被殴打，地方造反派发出声援。2月7日和8日，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区机关，军区调动部队镇压，得到中央军委表态支持。2月下旬，军内造反派有人被抓或受审。3月1日，宣布取缔反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一夜抓捕2000多人，在3月份，还取缔了一系列造反派组织。这期间，保守派得到迅速发展，并积极协助军区抓捕和批斗造反派。周恩来4月中旬到广州，代表中央表态肯定造反派，这使得军区放人、平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³

江西。当造反派在1月26日夺权时，省军区表示支持，但在2月份改变态

¹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明镜出版社，香港，2007年，第210—229页、254—258页。

²徐海亮编：《东湖风云录》，银河出版社，香港，2005年，第315—352页。

³刘国凯：《广州红旗的兴亡》，网络版，第70—137页。

度，支持保守派，发给他们大量枪支弹药，打死打伤大批造反派，并在吉安、赣州等地宣布造反派为反动组织，加以武装镇压。3月份以来共逮捕了4200多人，取缔了300多个组织。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责成原司令员吴瑞山向造反派检讨。

河南。军队1月下旬介入文革之后，支持造反派的对立面，1月30日与保守派一道举行武装大游行，把支持造反的干部刘建勋、纪登奎说成是走资派。省军区宣布造反的“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用飞机散发传单，对河南二七公社等造反派实行了大搜捕、大镇压，强迫进行“非法组织登记”，据说全省被抓捕约2万人。中央在6月宣布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吉林。在1967年的1月24日实行了“一·二四大镇反”，强行解散“省工造大”、“自发造大”和“省体校造大”，700多人被抓捕，24万多人被迫“自首登记”。3月4日，再次把长春公社一派的学生、工人、军内造反派数百人逮捕入狱。到4月份，随着“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¹

辽宁。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1月底几次出动部队压制造反派，抓捕其负责人，还宣布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在3月，宣布辽大八三一、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等组织犯了错误，抓他们的人，或支持扭送、拘禁其负责人。

河北。石家庄驻军以军管会的名义扶植已经垮台的保守组织，把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或“右派组织”，加以砸烂或强迫解散，对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抓捕、批斗、审问。反击“二月逆流”之后，对造反派的压制一直到6月份仍在进行，武斗不断，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在保定，2月11日军队、公安出动大量人员对造反派大逮捕，摧毁270个以上造反派组织，抓捕1000多人，临时扣留2万多人次，甚至在“军委十条”下达后还在镇压。

天津。造反派在1月20日实行夺权，但在2月份即被宣布为反革命夺权，被迫请罪，被分化瓦解，或被取缔、镇压，保守派得到迅速发展。

云南。对造反派的镇压多半发生在专县地区，保守派在2月份复活，对造反派反攻倒算，造反派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其负责人被逮捕。

西藏。军区在2月底宣布造反的“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为反动组织（据说中央军委有批示，说该组织是反动组织），予以取缔，逮捕首要分子，3月初开始抓人，紧接着发布文告，禁止串连和“四大”。军区在接到中央的“四一指示”之后转变态度，造反派组织逐渐恢复。

有的地区形势并不是十分清晰，比如广西。虽然从1967年5月起，广西军区对造反派的压制和打击，对保守派的支持，其态度之坚决和时间之长久都属于

¹长春公社报编辑部：“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顾”，1968年8月29日。

全国之冠，但1月23日造反派夺权时，军区表示支持，在26—28日，还应造反派的要求到一些单位进行支援。直至2月中旬，军区还表态认为夺权的造反派虽然犯了种种错误，但其大方向正确。军区态度转变发生在2月底3月初，造反派指责军区支持保守派而不支持造反派，犯方向、路线错误，从4月中旬起，因为军管《广西日报》社，双方矛盾加剧，从5月起，冲突升级。¹

新疆的情况同样复杂和难于定性。这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六流血事件”，造反派被军人开枪打死，以及2月11日造反派包围、冲击军区。但因为新疆军区曾支持造反派的“一·二五夺权”，当造反派攻击军区时，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一样去电表示“不准反对新疆军区”，所以新疆造反派被镇压与本文所论述的“二月镇反”的标准情况还是有一些不同。

宁夏。造反派在1月27日实行夺权，宁夏军区支持并参与了夺权活动，但随着“二月镇反”在全国的兴起，军队改变了态度，2月11日，宁夏军区发表公告撤销对夺权的支持，于是这次夺权在16天后流产。19日，军区发表《给全区人民的一封信》，指“一·二七夺权”是“右派夺权”，并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在形势剧变之后，甚至到了5月底，军区仍然支持保守派，拒不给造反派平反。

安徽的情况与四川不同，但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在于，毛泽东在1967年1月和4月在全国范围内两次强令军队转向，从压制造反派到支持造反派，都是根据该省的情况作出的。运动初期，安徽省军区支持被当作走资派的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支持省委对造反派的压制，在毛泽东命令支持左派之后，转而支持造反派“八二七”，并参与其“一·二六”夺权活动。夺权时造反派分化，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称为“好派”或“G派”，另一派说夺权“好个屁”，称为“屁派”或“P派”，军队支持好派而镇压屁派，3月中旬，军区受到中央批评，被说成是“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后来的批判和清算中，这种错误与“二月逆流”挂上了钩。²

江苏是否应划入发生“镇反”的省份，似乎会有争议。一方面，军区支持并参加了造反派的“一·二六夺权”，另一方面，后来有一个“三月镇反”，起因于造反派分裂为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夺权未得到中央承认，江苏在3月份实行军管，支持夺权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军队，从而引来镇压，数百人被抓捕，10多个造反组织被取缔。

结局与后续影响

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6—35页；晓明：《广西文革痛史钩沉》，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06年，第11—13页。

²见梁守福：《乱流浮沉半生缘》，电子版，第46—74页。

“二月镇反”的结局是被当作“反动路线的复辟逆流”被反击和粉碎，各个实施镇压的军区、军分区纷纷检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迫转向，从支持保守派不情愿地变为支持造反派；被镇压的造反派得到平反，组织迅速恢复和扩展。从全国形势看，总的情况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彻底胜利”，造反派占了上风——多数情况下又产生分裂和对立，派别斗争以新的形式出现，对于保守派而言，基本上是大势已去。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比如在广西、广东、湖北等）军区虽然做了检讨，但口服心不服，一有机会就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在军区态度比较顽固，保守势力根基深厚的地方，保守派坚持到毛泽东没有耐心和力量把“两条路线斗争”和派别斗争进行到底的时候，终于被当成“革命群众组织”成为“革命大联合”的一方，在“三结合”的“新生红色政权”中取得一席之地。

反击“复辟逆流”的号角声是从1967年3月下旬吹响的，最初的迹象和声音出现在北京，慢慢传播到全国各地，4、5月份形成新的气候，有的地方局势明显改变已经是到了夏季。

3月24日，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其中认定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等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2月23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等人负责，赵永夫被隔离收审；要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要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这个决定发出了明确的否定军区镇压的信号。

在4月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所发布的命令已经超出解决安徽问题的范围，而是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否定“镇反运动”的政策：“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4月6日，发布“军委十条”，这其实是对此前“军委八条”的矫正，是对“二月镇反”的彻底整肃：“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

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这几个决定，对于犯错误的军区等于是判决书，对于受压制的造反派不啻于战鼓和冲锋号声，被压抑的精神和能量冲天而起，对于那些在文革运动中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来说，他们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更要为自身的解放而战。

5月7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针对四川这个“二月镇反”典型省份的处理规定，也成为“二月镇反”结局和后续影响的典型。该决定说，“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二月镇反”运动中的遭遇和表现，成为革命路线胜利之后群众组织定名分、排座次、要待遇的依据。协助军区镇压的“产业军”等再次被确认为保守组织，被镇压的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被当成是左派和依靠对象，而“红成”这一派虽然保住了“革命组织”的地位，但在实际上明显沦落为被团结和联合的对象。“红成”不可否认是造反派——1966年11月中旬之前川大八·二六是“红成”的一个支队，但“红成”在“二月镇反”中地位暧昧，被成都军区视为“犯了错误”、“可以团结”的组织，它受到极大压制，但在总体态度上支持镇反，其中有人积极协助“镇反”，也有一些下属组织受到镇压。

中央的决定措辞微妙：“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虽然同为“革命组织”，但主次地位之分是可以体会出来的。1967年春夏之交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巡访四川，王力在私下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把“红成”称为“上中农”，这个称呼很传神，代表了文革派中央的真实想法。

在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革命在农村依靠的对象是贫雇农，“上中农”勉强可以混迹于革命阵营，但无非被团结和利用，而且还需要教育与改造。对于“红成”而言，“上中农”的名分是羞辱性的、不可接受的。“红成”不敢对抗中央，或者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央英明，没有歧视自己的意思，而把气出在对立派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身上，并归罪于四川新任的

第三和第四把手刘结挺、张西挺。刘、张原为四川宜宾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红成”冒险犯难为其翻案，获得成功，“红成”认为刘、张翻身之后对自己忘恩负义，对其恨之入骨，掀起“打倒刘、张”的浪潮，在大半年的时间内，把成都和大半个四川的文革运动引到这个方向。

“红成”不明白，刘、张的态度不是因为他们忘恩负义，而是听命于中央，在文革派中央那里，造反派根据其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听命程度，对于“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坚决程度，在“反动路线”猖獗时受压制的程度，是要区分为心腹和外围的。他们很想不通和深感委屈的是：“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冲击军区，为什么不听话的吃香，听话的受气？”

“二月镇反”的动力和根源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关于 1967 年 2 月这个重要时段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故事即“二月逆流”，它讲述的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即几位元帅和副总理于 2 月 16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大吵大闹，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奋力抗争的事。

这个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真假难辨，但至少不是 1967 年 2 月历史的全部。它显示了中共体制内抗拒文化大革命的企图和努力的冰山一角，而巨大的冰层潜藏在中国文革叙事的水面之下，它由近百万人被捕、近千万人被游街请罪、数千个群众组织被取缔等等事实构成。

2 月 16 日大闹怀仁堂，2 月 17 日在四川漫天撒下镇压造反派的“中央军委二·一七信件”，这不是偶然的。前者是抗拒文革的党内上层的怒火中烧，后者是国家专政工具对文革的社会基层力量的全面扫荡。

“二月镇反”，责任在各地军区，在中央有没有一个总根子？镇反的步伐那么一致，方式那么相同，应该有一个总的动力源。许多军区的镇压，都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明确指令或表态，根子应该是中央军委。我们或许可以说，在 1967 年 2 月发生的，是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角力——这点可以由林彪的几员大将的回忆录证实，更大胆也更难得到确证的，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斗法。

两种对立的方针表现在：是强调军队应该保持稳定，军事领导机关不得受到冲击，还是要进行军内的文化大革命；如果造反派冲击了军区，应该镇压还是原谅、姑息？

在 1967 年 1 月上旬开始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制定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在 1 月 14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然而就在同一天，发表了由中央文革授意，以“《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写出的文章《一定要把

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其中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打击革命左派，压制群众运动，转移目标，保护自己，妄图扼杀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规定在领导机关不成立组织，军以下单位只搞正面教育。

最明显的交锋是，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否定之前林彪制定的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政策，口气严厉地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这个颁发于1月23日，名称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命令：“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并要求，“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然而微妙的是，在1月28日，又出台了一个“军委八条”，其中提出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军内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不准乱搞批斗，外出人员要迅速返回，不准冲击军事机关，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等等。

林彪的心腹之一吴法宪说，关于支持左派的文件，“可以说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而“军委八条”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林彪的口授而定，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反对，林彪亲自去见毛泽东，得到毛的同意。¹

在毛泽东同意发出“军委八条”之后，林彪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²

“二月镇反”运动中，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赋予四川镇反合法性的“中央军委二·一七信件”是叶剑英签发的。据吴法宪说：“青海事件发生后，赵永夫曾经打电话报告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答复说：‘你们打得好，打得好！’”³很难设想，没有林彪的点头，生性谨慎、在文革中地位岌岌可危的叶剑英有胆量和权力下达一系列镇压造反派的命令。

难题在于，如果说林彪的点头是必须的，那么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同意不也是必要的吗？难道“二月镇反”的总后台是毛泽东？我认为不是，毛泽东给1967年文革运动规定的任务是全面夺权，造反派是夺权的马前卒，1967年2月还远远未到抛弃和牺牲造反派的时候。从4月之后为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的彻底，对

¹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香港，2006年，第649、648页。

²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7年，第829页。

³《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669页。

各军区“方向、路线错误”的深究不放等情况看，“二月镇反”的后台不是毛。

但是，中央军委下发指示，不可能条条都是背着毛干的，这就有一个毛泽东知道不知道、同意不同意的問題。

现在还没有条件揭示真相，我的猜测和解释是，不可能每个文件、每个决定都背着毛，但毛的认可要么是不情愿的，要么是含糊其辞的，为以后的反攻倒算留下了余地。我们已经知道，毛对文件的批示有“很好”、“同意”、仅仅圈阅之类的区别，甚至对请示有“相机处理”这样的不是回复的回复。他和林彪玩的游戏还是有某种规则：原则上是毛说了算，但如果林彪讲出了毛自己说过的道理，或道出了毛不得不考虑的利​​益，毛就只好同意，勉强同意或者暂时同意。

林彪被毛赋予权力和责任指挥管理军队，在文革中他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军队稳定、不受冲击，一般而言，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认可这一点，因为他把党和政府砸得稀烂，并造成全国天下大乱的形势，他总得手上有一张牌，保证自己的最终控制权，这无疑就是军队。按官方的说法就是“军队负担着保卫国防的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柱石”。一般而言，林彪采取使军队保持稳定、不受冲击的措施，毛不能反对，只能支持。这就是他不得不批准“军委八条”等命令的原因。

但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是要通过非组织和非程序性方式废除原有的党委和政府，按自己的心意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他需要造反派打冲锋，而造反派在多数地方力量弱小，受当地党委和保守派的压制。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异乎常规的办法——动用军队支持造反派。他甚至一再命令军队发枪给左派即造反派，武装左派，这其实就是用武力消灭对立面，在新形势下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废除林彪的“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政策，在当时条件下有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在很多地方当地驻军是支持“走资派”和保守派的。这也很自然，依照文革前的体制，各省的党委书记担任省军区政委，党、政、军本来就关系密切，而军队平常所受到的阶级斗争教育，使得军人天然地倾向于听话、党团员多的保守派。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毛的文革理论认为走资派不但在党内和政府内有，在军队内也有，因此，搞军内的文化大革命，揪出军内的走资派，就是文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真正做到不让军内造反派闹事，不让造反派冲击军区机关，又怎么把文革之火烧到军队呢？

站在旧有的正统立场上，林彪及其手下的将军们以及广大的军人，有理由抱怨毛泽东，认为他的要求不合理：我们军队对你的最大忠实，就是保持稳定，作为你的威慑力量，让你放手在全国乱搞，想干掉谁就干掉谁，我们不管，但军队本身怎么能搞文革，怎么能乱呢？然而，不论林彪还是其他军人，在所有的道理

之上还有一个最大的道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毛说过走资派混到了军队里，毛关于军队的指示是天然正确的。

在相互矛盾的原则、政策存在的情况下，具体应该怎么办，有各自解释的余地，要依情势的发展变化和博弈双方的意志与技巧而定。林彪曾经抓住机遇，成功地打击了造反派，而且还得到了毛的认可，这就是发生于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事后叶群的一句话说得很到位：“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¹

对不同观点的回应

“二月镇反”是文革运动预定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还是文革的曲折和“逆流”？是出于文革发动者的意愿和部署，还是对其意志的违反与抗拒？总之，我们要问：“二月镇反”为什么会发生？

文革研究者中，有人作出了与本文作者大不相同的回答。回应这些不同的说法，不是出于喜好争辩，而是有助于更深入的研究。

何蜀认为，“‘一月夺权’并未建立起‘革命新秩序’，并未带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面貌，反而加剧了社会大动乱和导致生产急剧下降，这必然使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警惕有‘阶级敌人’在趁机破坏，尽管这时毛泽东强调的是‘路线斗争’，但其‘斗争哲学’中的核心理论始终是‘阶级斗争’。因此在1月以后毛泽东的有关批示、中央文件和报刊社论、文章中就频繁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提法。”“1967年2、3月间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打压，即‘二、三月镇反’运动，实际上是在毛泽东部署下进行的。”²

如果“镇反”是毛部署的，那怎么解释之后毛对“镇反”的坚决否定和反击呢，怎么解释他强压各大军区、省军区作检查和自我批判，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何蜀说，那是因为毛看到“镇反”造成了结束文革，恢复旧秩序的趋势，他出尔反尔，玩弄文字游戏。我认为，这个解释有些牵强附会，把毛泽东的战略策划和战略部署能力看得太低了。

毛泽东对于1967年的战略预期和部署根本不是建立秩序和促进生产，而是全面夺权，为此他不惜号召在全国开展全面的内战（见诸于官方报刊时改称为“全面阶级斗争”）。³毛的夺权不是从传统的“阶级敌人”那里夺，而是从“走资派”即各级党政官员那里夺，要消灭支持他们的社会力量即保守派群众组织。令毛失

¹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527页。

²何蜀：“论造反派”，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香港，2007年，第504、507页。

³见阎长贵“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载于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望的不是未能建立秩序和增加生产，而是支持他的“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力量不如保守派，为此毛命令军队支持左派即造反派，甚至不惜发枪武装造反派，把对立派斩尽杀绝。而军队——不论是出于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还是自觉地利用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命令中的“支左”落实为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于是就有了“二月镇反”。由于“二月镇反”直接违反毛的意旨，所以才有后来坚决、彻底的否定，才有被镇压的造反派组织的平反、恢复和急速壮大，直至在“新生红色政权”中占有相当份额的席位。

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的还有周伦佐，他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中说：“徐友渔认为：‘二月镇反’军队镇压造反派的原因，并不是发现其中混入大量成分不好的人，而是因为造反派对军区采取了游行示威、静坐、冲击等行动，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又是由于军队镇压了处于少数地位的军内造反派所致。”“我认为作者似乎忽视了事件的‘原因’与‘导因’之间的联系。作者所否定的论点和所认定的事实，其实正是‘二月镇反’的原因与导因。军队历来是中共阶级斗争理论的坚定信奉者和主要实践工具，‘文革’中自然成为保守心态最顽固的群体，对家庭成分复杂的造反派及其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在心理层面一直充满敌视，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之所以招致镇压，就是因为军队早已从‘人员不纯’这一阶级底线上，认定造反派属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所说的‘右派’——右派冲击军事机关当然必须镇压。”¹

我在此愿意承认，我曾经断言军队镇压造反派并非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成分不好的人，这是太简单了，我的全面认识可以表述如下。

首先，我还是不主张简单地用“成分不好”来解释军队镇压造反派，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到军区去造反而遭到镇压的军内造反派不存在成分不好的问题。但为了争辩的目的而强调这一点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从长远和根本上看，这确实是军队随时抱有、永远抱有镇压造反派强大心理动力的根本原因——我想，我和周伦佐以及其他研究者，都不是仅仅在字面上理解“家庭成分”这一概念，它还包含是否为党团员、积极分子、“靠拢组织者”等一系列当时人所共知的内容。不论从组织成分还是从现实表现（攻击党的组织和领导者）看，军队都倾向于把造反派看成是准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认为他们是在乘文革之机实施阶级报复和从事反革命活动，所以军队镇压起造反派时是那么积极主动、毫不手软。

但是，军队对于造反派的成见只能解释镇压的积极性、主动性，镇压的可能并不等于镇压的实现，事实上，文革中也有一些部队和军区不但没有镇压，反而支持了造反派，他们多半是与地方没有瓜葛的野战军、空军，以及调防的新进部

¹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田园书屋，香港，2006年，第147页。

队等等，其中有的是得到了文革派中央的“路线交底”，少数是琢磨出了“路线斗争”的门道，可见成见并非决定性因素。中共对军队的控制一向严密而有效（青海赵永夫和内蒙古军区一些人敢于对抗是例外），对造反派的成见可以解释镇压的广度和力度，探讨镇压的原因和本质需要回答：“谁下的命令？为什么？”由于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文革的发动者也是毛泽东，因此研究文革中“二月镇反”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与镇反的关系。于是，问题又回到了“二月镇反是不是毛泽东的部署？”

周伦佐用两种矛盾冲突来解释“二月镇反”的发生，其一存在于整个中共政权与造反民众之间（对此官方用“阶级斗争”理论进行解释），其二发生在高层内部两派之间（对此官方用“路线斗争”理论进行解释），他认为首要因素是第一种，是“二月镇反”的大背景，次要因素是第二种，是小背景。

一般而言，牢记周伦佐所说大背景是理解中共治下历史的重要因素。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自始至终是文革得以开展的前提和限制性条件，这意味着，不管文革怎么搞，现存的制度不会变，共产党的领导不会变，任何有可能动摇现状的行动都被视为非法，任何火花都要立即扑灭。

周伦佐认为，1966年底和1967年初造反派势力急速扩大的态势，已经使毛泽东感到中共政权受到了威胁，因此，毛的整体战略布局是镇压造反派，而在按他的部署实施镇压的过程中，被高层反文革力量利用，直至他发觉而发动反击。

1

具体到分析“二月镇反”的原因，我不能同意周伦佐的观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本目的是要打击“党内走资派”，而不是传统的“阶级敌人”，他在1967年的战略目标和战斗任务，是从“走资派”那里夺权，而不是肃清“旧社会的残渣余孽”，他当然不允许有人乘文革之机造共产党的反，但专政机器是如此强大，那只是一个顺带留意，而提不到“战略部署”层面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他命令“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这个左派指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造反派，而不是“走资派”组织起来的保守派。

毛泽东随时可以打击传统的阶级敌人，但在1967年初，这绝非当务之急；毛完全可以抛弃、牺牲造反派，但那是在新政权在全国建成之后，在1967年初，造反派的利用价值还没有充分发挥，还需要他大力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好多运动的关节点，在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框架中无法解释，而需要用“路线斗争”的思想才能解释，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难于解释，只能用“继续革命”的思路才能解释。毛泽东和文革派责难党委与工作组，解放“右派

¹ 《“文革”造反派真相》，第155—162页。

学生”；他们带头批判血统论，伸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们一反运动一来首先拿知识分子开刀和打击“牛鬼蛇神”的做法，宣称那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都是只能借助于“路线斗争”的思路才能理解和解释的。“二月镇反”就属于这一类现象和运动的关节点，尽管在其过程中毛泽东和文革派也有放松了“路线斗争”的警觉性、被传统“阶级斗争”观念困扰的时候，于是造成同意福建驻军打压造反派，湖南省军区镇压“湘江风雷”，同意发布“军委八条”的事情，但他们一旦明白过来，就毫不迟疑地纠正与补救。

在文革中，毛泽东一度与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军队对着干，就像他一度与作为他的统治力量基础的党委对着干一样。总的说来，毛泽东发动文革，似乎就是与他的同僚，他所缔造与维护的政权、国家机器对着干。毛泽东的文革，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只有懂得毛的特殊目的、特殊手法、特殊部署，才能懂得某些关节点的来龙去脉和实质。不过说到底，不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路线斗争”，都是他臆想出来的，都服从于他的权力欲和私利。“斗争”是实在的，是他本人发动的，而“阶级”和“路线”，不过是为斗争服务的口实。

结语

有人可能要问，“二月镇反”这么大的事，怎么未见之于官方历史，而与之对比，“二月逆流”的故事到处流传，以至于许多民间人士都以为那是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的全部。

我的解释很简单，“二月镇反”的主要内容是镇压，对群众大规模的、无情的镇压，而对于任何统治者和掌权者，镇压无论如何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不论他们认为镇压多么必要、多么正当，被镇压者多么活该，多么罪有应得。镇压永远不是言说和研究的话题，而是需要隐匿和涂抹的对象。

而“二月逆流”似乎是开国元勋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支持毛的文革之余可以洗刷甚至自夸的一个亮点，于是被反复地、无限地炒作。其实，“二月逆流”是否真是像宣传的那样是基于正义的、义无反顾的抗争，还有仔细考究的余地，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论述话题。

“二月镇反”是研究文革绕不开的课题，如果本文的叙述大致正确，本文的分析或假设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对文革进程的描述就应该有相应的改变。文革中，发布重要命令往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家合一，现在看来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文革中，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两人的关系被理解为绝对的权威和无条件的服从，现在看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黑箱政治彻底改变之前，研究者的努力既

是艰难的、收效甚微的，同时又是没有止境、可能不断突破的。

【热点研究】

“二月镇反”与青海“二二三”事件

孙言诚

1967年1月至3月，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刮起了“镇压反革命”的风暴。两三个月的时间，数千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数十万人被捕，数百万人遭批斗、游街。镇压多从1967年2月开始，一般习惯称之为“二月镇反”。青海“二二三”事件就是“二月镇反”的典型案列。

“二月镇反”和“二月逆流”发生的时间相近，性质也相通：一个是镇压造反派，一个是反对造反派的后台——中央文革。对这两个事件，文革中和文革后官方有不同的解读。文革中，毛泽东把反对中央文革的行为定为“二月逆流”，把“二月镇反”定为军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被镇压的造反派则把二者联系起来，统统称之为“反革命复辟逆流”。文革后，官方把“二月镇反”和“二月逆流”解读为党政军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抵制。

随着官方态度的转变，青海“二二三”事件也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叙述和评价。文革中，“二二三”事件被中央定为镇压革命群众的法西斯暴行，涉事的赵永夫被定为在军内搞反革命政变的人，羁押受审。支持八一八的刘贤权则由中央任命为省军管会领导，负责筹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文革后，中央军委的文件虽未公开否定当年对“二二三”事件的处理（毕竟打死了那么多无辜群众），但却让刘贤权承担了“严重责任”。官方史书明显颂扬镇压群众的军方，贬斥八一八造反派。各种纪实文学作品，更是编造离奇情节，污蔑八一八群众，把“赵永夫将军”（实为大校）描写成平暴的英雄。刘贤权则被降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二月镇反”？如何判定“二月镇反”中镇压者与被镇压者的是与非？这就像文革初期的抓游鱼、打黑鬼、反右派一样，成了文革史研究中讳莫如深的话题。

本文拟以青海“二二三”事件为例，深入揭示“二月镇反”和“二月逆流”的实质，同时也从“二月镇反”和“二月逆流”的高度俯瞰青海，以期阐明“二二三”事件中令人难以理解的史实。

镇压反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题中之义

是谁启动了“二月镇反”？为什么“二月镇反”先是轰轰烈烈，后又偃旗息鼓？时间过去了近 50 年，由于官方有意掩盖，而文革研究者又鲜以“二月镇反”为专门课题，上述问题遂成了难解之谜。“二月镇反”的真实面目也显得扑朔迷离。

最近，徐友渔先生对“二月镇反”提出了如下看法：

“在 1967 年 2 月发生的，是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角力——这一点可以由林彪的几员大将的回忆录证实，更大胆也更难以得到确证的，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斗法。”¹

话虽含蓄，但意思却很明确，是林彪支持的中央军委（主持军委工作的是叶剑英）启动了“二月镇反”。“二月镇反”可视为以林彪为后台的中央军委与以毛泽东为后台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斗法。

这种观点我觉得是受了官方史书及一些高层回忆录的误导。文革后，为了证明虽然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党内依然有健康力量存在，官方史书千方百计地寻找文革中反对文革的“正能量”。先是抬出了周恩来，写他大树参天，庇护被打倒的老干部，与毛暗斗。周主持中央碰头会上的“二月逆流”，因被描述为高级干部群起反抗毛泽东的典型案列，甚至更名为“二月抗争”。叶剑英更成为了抗争的英雄。且不谈周恩来在文革中委曲求全、百依百顺，就是叶剑英，如果没有文革，他是连罗瑞卿也看不上眼的闲散人员，何来晚年的辉煌？文革中他虽遭毛两次贬斥，但对毛的愚忠痴心不改。说周、叶与毛抗争、暗斗，不过是为政治需要而编造的神话而已。

九一三事件后，黄、吴、李、邱遭连累入狱，一批四野的将领亦遭清算。时至今日，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暗流涌动，为林彪鸣不平，其情可悯。但为了美化林彪，他们把毛、林切割，暗示林彪反对毛的文革，那就过份了。1967 年 2 月林彪神化毛泽东正值巅峰，说那时林与毛斗法，无异天方夜谭。

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叶剑英，1967 年 2 月都是紧跟毛泽东、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们亦步亦趋，唯恐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步伐，怎么能启动“二月镇反”去和毛泽东角力？

那么，“二月镇反”是谁启动的呢？我赞成何蜀先生的意见，“二月镇反”是毛泽东部署的。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敢、也不可能发动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镇反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固然是反修、防修、清理走资派，即路线斗争。但他自始至终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此事他向林彪交过底。1966 年 8 月，林彪让秘书向毛泽东报送两份文件（《快报》和《群众来信简报》），文件记载：“在太原、

¹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载《领导者》总第 68 期，2016 年 2 月出版，另见《共识网》。

西安、兰州等地，极少数人在游行中乱呼反革命口号，有的人甚至将毛主席像撕碎踩在脚下。”林彪批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毛泽东当夜便批退回来：“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¹

时隔不久，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了这样一段话：

“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阴谋得逞。”²

在革命群众疯狂“炮打司令部”的时候，这段话发出了和“十六条”不和谐的声音。当权派和保守派正是以此为依据，遏制造反的势头，造反派则以为这是林彪的意思。殊不知，讲话稿是陶铸组织撰写的，写成后送呈毛泽东审阅，这段话正是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林彪不过是个传声筒。³

在文革发动的初期，毛泽东就警惕地、富、反、坏、右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准备引出几十万右派，其引蛇出洞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所要牺牲的左派，毫无疑问是指遭批斗的当权派。1967年初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成员时，对二炮司令员李天焕说：“你在打国民党反动派时出过大力，有一份功劳。搞文化大革命你又受了罪，同样有一份功劳。大家不要以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没那么回事。大家不要害怕到群众中去，顶多就是戴高帽子而已。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武器，经过反复较量，好人坏人就会清楚。”⁴原来李天焕在文革中的所谓功劳，就是用自己挨批斗引出坏人。

毛泽东其实也知道，挨批斗绝非“顶多就是戴高帽子而已”，他是“准备牺牲几千人”的。挨过批斗的邱会作说：“（毛）不惜用苦肉计识别干部”，“我心里难过极了。”⁵这可是过来人的甘苦之言。不过，“七二〇”时毛泽东的一席话，又熨平了邱会作的心灵创伤。毛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了吗？还造你的反吗？文化大革命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跑出来表演。”“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形势的看法。但有一点林彪同志没有提到，那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⁶

显而易见，毛泽东发动文革和他1957年整风是一个思路：一方面发动群众搞四大，清理整顿当权派；另一方面又通过运动暴露造反群众中的右派和反革命。刘、邓正是了解毛的这个思路，才敢于放手抓游鱼、反右派的，只不过他们没想

¹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35页。

²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

³李德、舒云《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950页。

⁴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85页。

⁵同上，第86页。

⁶同上，第149页。

到，毛还要先让造反群众清理他们。可怜的造反派在含着热泪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时，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正冷眼观察着他们。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来访的卡博和巴卢库说：

“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¹

聂元梓、蒯大富都靠不住，其他造反派也就可想而知了。清理并镇压造反派中的右派和反革命，和清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样，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题中之义。

毛泽东启动“二月镇反”

毛泽东要清理造反派，而且也确实清理了，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都是，但那主要是在造反派组织已经撤销之后。他启动“二月镇反”，却不是针对造反派，相反，他是要用“二月镇反”来支持造反派夺权。

1967年2月19日，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毛泽东2月12日—16日的指示，其中有如下内容：

“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二、三、四月份是夺权的决战时刻。当前有四大任务：1. 夺权；2. 抓革命、促生产；3. 镇反；4. 内部整风（整思想、整作风、整组织）。 ”²

镇反，赫然列为夺权决战时刻的四大任务之一。对于上海的镇反，毛泽东还有具体的指示：

“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改变。这是反动口号。”

“（上海）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前门进后门出。”

“这一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³

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反革命的理论基石。1957年，毛泽东把巩固或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列为划分右派的六项标准之一，文革中他又把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反动口号，可见坚持专政理论，毛泽东是矢志不渝、贯彻始终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也好，核心内容就是镇压反革命。

¹ 《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1976年卷补遗二，第290页。

² 《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毛泽东2月12日—16日的指示》，同上，第303页。

³ 《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毛泽东2月12日—16日的指示》，同上，第303页。

对于夺权必须镇反，《红旗》社论曾这样描述：“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¹

如果细加分析，毛泽东在夺权阶段提出镇反，目的似有两个：1. 纯洁造反派队伍（镇反和整风结合），防止地、富、反、坏、右篡权；2. 巩固夺权后的革命新秩序。

早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即指示谢富治酝酿制定“公安六条”。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正式公布，其第四条规定：

“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²

不准参加群众组织的人竟然多达21种，纯洁造反派队伍的网，织得甚是严密。同时，这也给“二月镇反”的执行者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发挥空间。

1月30日，毛泽东又对谭震林的报告作出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³

谭的报告是1月28日打给毛泽东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针对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⁴谭的报告，因为正中毛泽东引蛇出洞的下怀，故而受到毛的激赏。同一天，毛在修改《红旗》三期社论时，加了如下一段话：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¹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

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引自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³ 《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09页。

⁴ 同上，注释（3）。

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称为‘革命派’，实为保守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¹

这段话无疑是根据谭震林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写出来的，但它却和谭的态度有着根本的不同。谭的立场，在20天之后的“大闹怀仁堂”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他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指的是造反派，而毛却把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联系起来，矛头指向了保守派。所举实例如“荣复军”、“联动”便是证明。此后，关于反动组织，《红旗》评论员文章点了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谢富治点了“联动”和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周恩来点了“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湖南“纠察队”、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旗军”等。除湖南“红旗军”外，其他都是保守派。在修改《红旗》社论时，毛还特别点出：“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可以看出，毛泽东启动的镇反，尽管有纯洁造反派队伍的意图，但镇压的矛头主要指向保守派。他是在为造反派夺权保驾护航。

本来是支持造反派的镇反，怎么会演变成在全国各地普遍镇压造反派的运动呢？解开这个谜，还需要了解毛泽东为夺权采取的另一项措施：让军队介入文革。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发动文革，不怕天下大乱，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军队。决战时刻，毛泽东决定打出王牌，让军队支持左派夺权。这一着确实有效。青岛市“一·二二”夺权后，局势混乱，造反派背着一口袋大印东躲西藏，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军委杨成武打电话给六十七军，让他们上街游行，支持王效禹夺权，局势很快便稳定下来。最早夺权的五省市，上海是毛泽东亲自操刀，贵州有李再舍，山西有张日清，黑龙江有汪家道，可以说，军队的支持是夺权的关键。

60年代以来，在毛、林的呵护下，解放军声望如日中天。为了让军队有效地支持左派，毛泽东再次加码。1967年1月12日，毛指使江青、陈伯达起草《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送交林彪审阅，转呈毛泽东批准。1月14日正式公布。通知强调：“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各级政府都被冲垮的1967年初，军队成了唯一不许冒犯的圣地。2月27日晚，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在接见首都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时指出，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志。²

革命还是反革命，竟然取决于对解放军的态度，而多年来解放军严格的出身选拔，长年的阶级教育，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注定了他们在文革中倾向保守派，造反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¹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和修改》，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12页。

²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12月第1版，第321页。

第一个触线的是新疆建设兵团的石河子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石造联总）。他们的对立面八一野战总部（八野）是得到兵团和省军区主要领导人支持的保守派。夺权中两派冲突不断，为支持八野、镇压石造联总，部队先后在七个地方开枪打死 26 人，打伤 74 人。除 20 人是部队自己误伤、误亡外，其余 80 人都是造反派和无辜群众。其中有 12 岁的孩子马路和 13 岁的红卫兵王万东。这就是有名的“文革第一枪”——1 月 26 日的石河子事件。“新疆军区事后给军委的报告称：事件‘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毛泽东支持了军委的意见”。¹周恩来本还想调查一下，毛泽东批示：“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于是石造联总成了“二月镇反”的第一个牺牲品。

第二个撞网的是“湘江风雷”。此事笔者采访过戚本禹，他这样说：

“1967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通知》。很快，湖南省军区上报中央，说‘红旗军’、‘红导弹’等组织到军区打人、抓人，‘湘江风雷’到矿冶学院打砸抢，造成 100 多万元财产损失并打死了 3 个人。还说‘湘江风雷’有枪，株洲的‘湘江风雷’要上井冈山打游击，等等。报告好像是总理转给陈伯达的。当时文革小组的同志都支持省军区的看法，陈伯达和王力最积极（后来平反，王力也是最积极）。只有关锋冷静地说：‘这也只是一面之词。’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说‘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2 月 4 日，中央文革又做出《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

“有了尚方宝剑，湖南省军区一夜之间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全部头头，连支持他们的红卫兵也逮捕了。后来处理湖南问题时，省军区承认抓了 5000 人，总理说：‘你们抓了多少人？你们报了五千，恐怕有一万、两万、三万，绝非五千。’又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啰！因为这件事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总理都受了蒙蔽，我们更不用说了。这个错误尽管改正过来了，但当时确实给湖南的造反派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启动了全国范围的二月镇反。”

第三个闯下惊天大祸的是福建的造反派。1967 年 1 月，福州部队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26 日，部分造反派冲击大会，并到军区要韩先楚承认他

¹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一书中余汝信的注解，星克尔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78 页。

们是革命行动。31日福建前线部队发布公告，声称坚决执行军委八项命令，“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公告转发全军参照执行。2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的公告。2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把冲击军队的行动上纲为走资派勾结地、富、反、坏、右掀起的“反革命复辟逆流”。2月19日，《人民日报》转载该文，随后各地省报也陆续转载。

于是，一场由军队主导的针对造反派的镇反大戏，就在全中国轰轰烈烈地上演了。青海“二二三”事件，就是其中最惨烈的一幕。报社一役，打死169人，打伤178人，现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红卫兵告到中央文革，戚本禹、关锋请求调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死了这么多人，问题居然不大。别说学生先开枪，只要红卫兵手中有一支枪，八一八怕是难逃“反革命”厄运。毛泽东对枪杆子的钟爱可见一斑。“五一三”事件，林彪借文艺演出扶植三军保守派，镇压“星火燎原”等军内造反派，事后叶群对邱会作等人说：“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¹林彪对毛可谓知之甚深。

刘贤权奉命支左

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向中央军委请示，是否派军队警卫安徽造反派批斗李葆华的大会。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应该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速将主席的批示转发全军照办。”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结束了隔岸观火的局面，卷进了文革两派斗争的浑水之中。

1月22日，青海省军区接到军委传达毛泽东指示的急电，下午，刘贤权司令员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六人：刘贤权、王文英（副政委）、曾征（副司令员）、林山（副政委）、吴士杰（政治部主任）、赵永夫（副司令员），另有列席六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我们这里谁是左派。刘贤权对比了八一八红卫兵和红卫兵总部，认为八一八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正确。红卫兵总部也做了很多革命工作，但革命干劲不如八一八，而且保（省委），批“六三”社论，是保乌纱帽的。（赵永夫插话：干部子

¹ 《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527页。

弟也多。)王文英、林山、吴士杰均表示八一八是革命派。刘贤权总结：大家倾向八一八。吴提出，正式文件来了以后再研究。¹

1月23日，正式文件以明码电报下达。下午刘贤权再次召集常委会，出席者与上次相同。会上，刘宣读了中央文件，并宣布军区各部立即传达，晚上大家讨论谁是左派。王文英、林山、吴士杰、曾征明确表态支持八一八，赵永夫未发言。列席会议的李格正提出，议一下八一八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隐隐显露了干部中似有不同意见，但未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刘贤权列举了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²

会后，军区把常委会的决定上报了兰州军区和党中央，并电话告知驻青海各部队。刘贤权和王文英商量，常委会的决定暂不公布，待做好机关干部的思想工作后，再通知八一八。

晚饭后，吴士杰把常委会的决定悄悄散布出去，机关干部顿时炸了营。多数干部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左派应该是捍卫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有人说，常委已经做了决定，还叫我们讨论谁是左派，这不是把群众当阿斗吗？

八点半，八一八来军区报喜，林山出面接待，只表示欢迎，没明确表态。九点多，捍卫队来了，把刘贤权拖到办公楼前围攻，质问为什么支持八一八，有人撕下刘的领章、帽徽，要拉刘去游街。军区的一些干部虽然观点和刘贤权不同，却劝阻了捍卫队的人，说：“军区的事，我们自己解决，你们就别掺和了。”这才解了围。

捍卫队前脚走，军区干部后脚就造起反来。检察长高志岳喊道：“反！反！反！要革命的到楼上签名。”当场有15人签名，宣布成立“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群众造反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派王兆瑞持名单楼上、楼下动员签名。签名总数达153人。四十多年后，王兆瑞在座谈会上诙谐地说：“我当时是上蹿下跳，忙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签了。宣布名单时，竟然没有我。”

这一夜，西宁街头捍卫队和八一八的队伍不断游行，狂呼口号。省军区大院造反司令部逼迫刘贤权和常委表态，改变常委会决定。造反司令部的人觉得应该有个军区领导来带头。他们先找了王文英，王说：“你们这样干不行，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交党委讨论。”他们又找赵永夫，赵说：“你们造反好得很，我当然支持。”于是，造反司令部请赵做了顾问。

面对混乱局面，刘贤权于24日零时召开军区党委常委紧急会议。会上刘提出，为避免引起混乱，应该把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是革命左派都支持。大家表示同意，匆匆散会。第二天清晨，曾征到刘家，对刘贤权说：“我一夜没睡，紧急会议的决定我不同意。是革命左派组织都支持，这是和稀泥。

¹见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第272次会议记录。

²见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第273次会议记录。

我儿子是学生，了解情况，八一八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组织，我们还是应该明确支持八一八。你最好再考虑考虑，建议请示一下兰州军区。”

实事求是地说，青海省军区决定支持八一八，是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左派，就是指造反派。1月22日他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时，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一边，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¹林彪说得更清楚：“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不能调和折中，搞折中实际上是反动路线。”²当时在青海要支持八一八的不光是军区党委，其他部队也一样。文革后陈如意（55师师长）对刘贤权说：“当年55师大多数人意见是支持八一八，接军区电话通知后，更确定支持八一八。”³该师政治部一位负责人向笔者详细介绍了55师讨论支左会议情况，除后勤部外，司令部、政治部多数人都表示支持八一八。就连一贯敌视八一八的省长王昭，在1月7日省委书记碰头会上也说：“我们当然支持左派（注：指保守派），但目前要公开说支持八一八。”⁴可见，支持造反派乃是大势所趋。1967年时，大部分地区保守派已经垮了，各群众组织争当造反派，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要支持造反派。

文革后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说毛泽东让部队支左却不明确指出哪是左派，遂造成下边的混乱，甚至举出陈再道让江青指出武汉哪个是左派的例子。其实，这不过是军队为镇压造反派所找的借口。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到1967年初，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连街头大妈都清楚，军队领导会不知道？即使是打着造反派旗号的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是地地道道的保守派。有的军区为了掩人耳目，拉出一些造反派来当镇压另一些造反派的挡箭牌，如成都的红成、重庆的八一五、湖南的高司，但多数军区是赤裸裸地支持保守派。为什么会这样，前面已经讲过。

有些文章，特别是一些军队将领的回忆录，把军队支持保守派说成是对毛泽东错误的自觉抵制，这又过份了。军队支持保守派，也是毛泽东多年培育的结果。建国十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划分左右派的标准，一是看阶级成分（出身），二是看对党（各级党委）的态度。文革初期的当权派和“二月镇反”中的军队，正是根据这一标准才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他们也是在贯彻和维护毛泽东思想，何来抵制？

¹李魁彩《文革秘档》，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327页。

²李德、舒云《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002页。

³刘贤权夫人安绍杰采访记录。

⁴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昭是革命造反派的死敌——会议记录摘抄》，原省委文革《从头越》战斗队整理。

刘贤权是个老实人，他是真心实意地贯彻中央的决定。但一看到军区干部这么多人反对，他又动摇了。他对老伴说：“军区不支持，人家能不气愤吗？”于是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结果是，捍卫队批他走资派，八一八批他和稀泥，两边不落好。

文革后，中央军委行文说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要刘贤权承担该事件的“严重责任”。刘贤权在回答调查组的问题时说：“实际上，支左就是支派。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无论站在哪一边，都必然是支持一派而引起另一派的不满，全国都是这样。”这话深刻。刘贤权支持八一八，赵永夫支持捍卫队，哪个又支持对了？毛泽东的支左命令，给军队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赵永夫镇压“反革命”

赵永夫确实是个人才，作为青海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军衔仅是大校，资历比刘贤权（1955年少将）、曾征（1955年少将）、王文英（1964年少将）都低，却能掌控省军区，进而独揽青海驻军大权，把“二月镇反”这幕戏在青海演得有声有色，远远超过了福建的韩先楚、南京的许世友、甚至武汉的陈再道——那可都是开国上将、大军区司令哪！赵永夫的胆识、气魄，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掌控军区后，赵永夫在各种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讲：“要把刀把子切实掌握起来，采取统一行动，把八一八作为反革命组织来打击。要从个别镇压到整个镇压。”¹这段话可以视为赵永夫镇压“反革命”的纲领。

所谓刀把子，主要是指军队，其次是公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把利器。从1月23日开始，赵永夫一步步地掌握了青海的军队和公安，到2月23日，正好一个月，赵永夫就用这两把刀子把“反革命组织”八一八彻底镇压了。

1月23日夜青海军区干部的造反，在“三二四”会议上周恩来定性为赵永夫“篡夺军权”的“反革命政变”。主要原因是康生查了档案，查出赵永夫曾经是国民党员的历史问题。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对付无产阶级专政。刘贤权根据这一结论处分了一些军区机关造反干部，显然不妥。中共中央1978年50号文件纠正了这一错案，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正确的。但是青海省委为放赵永夫所作的请示报告，把整个“三二四”会议当做错案（中央似乎并未采纳），那就不对了。会议记录早已公开，事实清楚，打死那么多手无寸铁的群众，是震惊中外的血案，怕是翻不了。

¹ 《赵永夫反革命政变罪行录》，载《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

2007年，笔者参加了一次当年军区干部的座谈会，从大家的发言看，那晚的造反应该是自发的。支持保守派当年在军队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余汝信先生称之为普遍规律）。王兆瑞在会上讲，赵永夫是他们在造反后请出来的，他就是去赵家请赵出山的代表之一。但是，一旦出山，赵永夫立即成了“造反指挥部”的实际头头。在2月3日的会议上，海西军区政委王慰民对赵说：“机关造反派如没有首长撑腰，马上会瘫痪的。”赵永夫也当仁不让。他对各驻军领导说：“军区党委瘫痪了，没有人敢负责，大小事情都得找我解决。”通过1月23日的军区造反，赵永夫切切实实地掌握了军区的大权。

1月25日，赵永夫放捍卫队的人进军区大院批斗刘贤权。1月26日，赵永夫派彭克端、白玉兴等三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请示。据彭回来汇报：“徐副主席讲西宁部队联合行动好；刘司令员有问题，与刘志坚、梁必业有关系。”¹余汝信曾撰文：“据冼恒汉说，赵永夫整倒刘贤权，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既然没有上级的支持和同意，赵永夫哪来的劲头和底气？”²我想，这次请示，大概就是赵永夫的底气所在吧。

1月27日夜，赵永夫和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密谈。第二天，张奔走于各驻军领导之间，打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2月2日，赵永夫、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了2月3日的军队大游行。2月17日，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干部会议上，突然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的建议，获得通过。后来嫌名头太小，改为“联合指挥部”。联指领导小组五人，组长贾乾瑞，赵永夫、张晓川都是副组长。赵永夫说：“名义上组长是贾乾瑞，他经常不能来，实际上我负责。秘书长是陈郁文（205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至此，赵永夫就牢牢掌握了军队这个刀把子。

对另一把刀，赵永夫也不放松。

2月3日的会议上，王慰民问赵永夫：“对公安厅（指该厅保守组织——编者注）有什么看法？”赵说：“出身成分好，历史清楚，根子正。现在党政权已抓走，司法权不能叫他们抓走。”实际上，赵永夫一直在做公安厅的工作。在他的扶植下，公安厅成立了以衣竹林（原副厅长）为首的“临时接管委员会”。苏太福和义福林是“军联指”和“临管会”之间的联络员。从1月31日到3月26日，他俩带衣竹林去见赵永夫11次。“二三”游行，公安厅逮捕反革命，军队乘250军车游行声援。“二二三”事件军队攻打报社，公安厅分头捕人。两把刀子珠联璧合。

手握两把刀子的赵永夫，分四步镇压了“反革命组织”八一八。

¹张震宇向机关干部作检查时讲的，见张江霖工作笔记。

²余汝信《“赵永夫事件”浅析——冼恒汉回忆录补正之二》，见《余汝信文集》，第476页。

第一步是“二三”游行。八一八夺省委大权后，遵照毛泽东指示进行整风，清理出杨守礼等6名“反坏分子”，送交公安厅。2月3日，公安厅配合保守派贫下中农红卫军开控诉大会，会后押杨守礼等人，脸上画着八一八字样，头上戴着八一八袖套游街，赵永夫亲率4000名战士游行声援。

第二步是2月13日宣布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第三步是2月15日军管报社。

第四步就是2月23日取缔“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所属组织。赵永夫调了13个连队，8个连围攻报社，5个连控制市区，终于酿成了死伤337人的惊天血案。

赵永夫的镇反是符合“二月镇反”的大形势的。《解放军报》那篇《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文章，《青海日报》本已转载过，“二二三”后赵永夫又让报纸转载了一次。两次转载该文的，全国仅青海一家，足见赵对全国形势和军委的态度都很了解。他也确实得到了军委的支持。军区造反的第三天，他派人赴军委请示，张震宇（独立师政委）说是“去告（刘贤权的）状”，果然告准了。“二二三”当晚，叶剑英又电话指示：“你们要进一步把头子搞清，枪支要进一步搜查。你们这样做，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正确。对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要彻底查清，坚决打掉！”2月25日，叶剑英办公室给军区电话，要“指挥和了解‘二二三’情况的首长，立即来北京参加开会”。参加的是军以上干部会。赵永夫、张晓川兴冲冲地去了北京，赵还在会上做了镇压反革命的经验介绍。如果不是行事鲁莽，闯下大祸，赵永夫还真可能像有些纪实文学写的那样，成为“平暴英雄”。叶剑英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了解毛、林的态度。林彪曾让秘书给叶传达过《对开枪问题的绝密指示》。林的原话是：“如确认是反革命性质的反军罪行，开枪镇压前必须报军委批准后方可实施。”毛改为：“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倾骨干分子。”看了指示，叶剑英曾高兴地对叶群说：“现在我才明白，好多东西，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其实不是！”¹他完全是按照毛、林的指示镇压反革命，只是没有想到，赵永夫隐瞒了真情，八一八是没有枪的。

文革后，叶剑英几次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赵对人说：“这些年，我是替中央背了黑锅。”仔细想想，他说的也不全错。

那么，八一八到底是怎样的“反革命”呢？且不谈八一八的领导人，那是在政治条件上挑了又挑的。就是连八一八也认为是坏人而加以清洗的杨守礼，恐怕

¹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也难以算得上“反革命”。笔者手头有一份贫下中农红卫军揭露其罪行的大字报，摘录如下：

杨守礼，男，34岁，汉，中农出身，河南长垣县人，现住西宁市石坡街94号。

其父：杨永昌，天主教骨干分子，反革命。

二哥：杨守业，1947年在匪首黄协部下当土匪，被群众砸死。

至于杨守礼的具体罪行，则是“盗窃香烟”、“长途贩运”、“开地下工厂”等等。就是这样一个人，先是被八一八开除，接着是被逮捕游街。八一八从囚车上劫下他来，又带到公安厅门前，用皮鞭抽打他给公安厅的人看。他成了包括保守派、造反派在内所有革命群众表现自己革命的道具。

赵永夫深谙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把家庭成员有些“问题”的杨守礼当作“反革命”，通过镇压杨守礼来镇压八一八，结果是死伤数百，逮捕一万多，残酷折磨无数。康生更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家，他抓住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问题”，把赵当作“反革命”，通过镇压赵，把“二二三”血案中央应负的责任，巧妙地推到“反革命”的头上，结果捍卫队又有不少人挨打，赵永夫更是家破人亡。

翻过来覆过去，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惹的祸。大家都想当无产阶级去专别人的政，殊不知在专政理论的指导下，别人也可以当无产阶级来专你的政。

小结

没有“二月镇反”，就不会有“二二三”事件。而从“二二三”事件可以看到，镇反虽由各省军区操刀，根子却在中央。没有军委徐、叶的支持，赵永夫决不敢无视兰州军区的命令造省军区司令员的反。叶、徐是“大闹京西宾馆”的主力，由此亦可窥知，“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一脉相承。

“二月镇反”中的镇压者与被镇压者，其实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镇压者（军委、军区、保守派）秉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反革命绝不手软，以致不惜开枪酿成血案；被镇压者（造反派）秉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党、政、军中的走资派，斗争到底誓不妥协。生活的悲剧往往由理论的荒谬造成。二战后，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把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纳粹怕是难以复活。文革中丧命的人数不止六百万，但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和继续革命理论似仍各有人坚执，保不准什么时候又会风波再起、悲剧重演，这真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2016年5月1日再修订

【热点研究】

“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

何 蜀

两个概念

“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是有关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民间叙述中长期含混不清的两个概念（官方叙述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官方叙述中只有“二月逆流”这一个概念）。

“二月逆流”，最初指的只是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几位老干部对文革中一些具体的极端做法表示不满，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一事，时称“大闹怀仁堂”。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¹因此，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康生在讲话中说：“‘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²当年最先遭到以“二月逆流黑干将”罪名公开批判的就是谭震林，由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专院校反击“二月逆流”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首都农林口、工交口、外事口、财贸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大事记》（1968年5月印发）中，就写上了1967年“三月七日，北师大井冈山、北农大东方红首当其冲，进驻农林口各部，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战斗口号，打响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炮。”³这些都说明当初所称的“二月逆流”就是“大闹怀仁堂”一事。

但是康生在上述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的同一个讲话中，又把“二月逆流”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1483页。

²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³ 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的概念扩大了，说：“‘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¹在康生讲话之后，姚文元讲话中还说：“‘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虽然也提到京西宾馆，但说“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也还是指的“大闹怀仁堂”。

以后，“二月逆流”就扩大到了1967年1月19至20日的京西宾馆中央军委碰头会（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和2月11、16日的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文化大革命结束并被彻底否定后，官方史学界又将其改称为“二月抗争”，以彰显中共高层的一些原本也应对文化大革命负一定责任的领导人（或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场浩劫中多少还有些值得肯定的闪光点。其实，“大闹”、“逆流”也好，“抗争”也罢，都是在党内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这本来应是合法而且正常的，却被不正常地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将其丑化或美化了。

“二月镇反”，则是从1967年2月开始，发生在全国许多地区，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通过支左部队及公安机关（许多地方是由公安机关中夺权掌权的群众组织出面），大规模逮捕造反派人员、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事件。因这一镇反运动在许多地区是在3月进入高潮，若要更准确些，应称作“二、三月镇反”。

自1967年春末中央文革小组按毛泽东旨意发动“反击二月逆流”以后，各地群众大多把“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联系起来批判，甚至认为发生在地方上的“二月镇反”就是“二月逆流”在地方上的表现，“二月镇反”就是地方上的“二月逆流”。其实这是一种或无心或有意的误解。事实上，“二月镇反”已在许多地方普遍开展起来以后才发生了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大闹怀仁堂”事件，而“二月逆流”已经遭到“龙颜震怒”的毛泽东喝斥，涉案的“三老四帅”们已经在挨批判、做检讨之后，许多地方的镇反才进入高潮——比如，“二月镇反”中最血腥的青海“二二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还电话赞扬赵永夫“你们打得对，打得好”²，而叶剑英已经在此前的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上当面看到了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的震怒态度，而且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检讨，会议还决定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³。难道说叶剑英会在这样的形势下“顶风作案”继续掀动“逆流”？显然不会是这样。

仔细推敲起来，可以看到“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虽有思想倾向上的共通之处，但并不是一回事。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当年的中央文件和官方社论文章及重要讲话中，曾反复批判“二月逆流”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¹ 同上。

²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62页。

³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452—453页。

可是却只字不提“二月镇反”（只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批评了成都军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并未使用“二月镇反”这样的概念）。这岂不是耐人寻味的吗？

毛泽东最早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

许多“二月镇反”的受害者，至今都还认为是毛泽东再一次“解放”了他们，深有“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之感。实际上，将群众组织或群众打成反革命或给予平反，都只是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仔细考察文化大革命历史，就会发现，正是毛泽东最早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

1967年1月，在毛泽东号召下全国掀起的夺权高潮中，1月26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地区因造反派夺权而发生流血惨案。“26日凌晨3点到下午3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六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二十七人，打伤七十八人，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此事件的观点大相径庭。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毛泽东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四十六人。”¹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这些冤死者和蒙冤入狱者，才得到“公开彻底平反昭雪”²。

石河子事件发生后，经毛泽东批准，于2月1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其中规定：“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生产建设兵团革命群众可以在本连队（车间）和团以上机关的本部（处）建制内建立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凡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的，应进行夺权；但事先要报上级党委、文化革命委员会批准。”“生产建设兵团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有的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如有严重问题，可根据群众的意见，由上级党委采取改组、撤换的办法处理。已经夺了权的单位，要经过上

¹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407—408页。

²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408页注92。

级调查核实批准后生效。”这个“十二条”，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而让兵团的文革回到了“反右”、“四清”的老路上。

关于新疆石河子事件，从首都三司到首都红代会都不断支持新疆造反派上访告状，中央文革小组也支持翻案，但始终无用。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倒台后，周恩来在接见丁盛、裴周玉等新疆军区领导人时说：“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主席看的材料比我们多，主席从头到尾把情况告诉我们。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生产兵团成份不纯，石河子就是有陶峙岳的人在里边，有张仲瀚的人，去的劳改犯多，有盲流，情况复杂，边境还闹事，对保卫边疆不利，才决定军管，这是主席告诉的，所以才起草了二月十一日的文件（十二条）。是你们（指丁、裴等）起草的，我修改的，中央文革讨论的，主席、林副主席审定的。王、关、戚想插手，我说，这地方不一样，与青海不同。”¹

1968年8月31日，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一九六七年初，毛主席及时、英明、果断地处置了石河子反革命事件，作出了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十二条），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²

毛泽东对石河子事件是怎样批示的，至今仍未披露。不过，已经公开的一个比石河子事件更早的毛泽东批示，则清楚地证明了在文革中最早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正是毛泽东。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的报告上写了这样的批语：“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³

披露此条批语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编者所加注释介绍的有关背景是：“中共延边自治州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东北局、吉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十八日下午三时，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系统同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为《延边日报》的接管问题发生武斗，已造成伤亡，规模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州委三次派人到双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均未成功。现在他们不信任州委，州委无法进行工作，事态发展又十分严重，急请中央文革给双方来电话或电报，制止冲突。”⁴

¹ 1968年5月4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建设兵团在京负责同志时的指示。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² 1968年8月31日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195页。

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195页注1。

这是迄今所能看到的公开资料中毛泽东最早将群众组织明确定为“反革命派”的一个批示。为什么仅凭一份报告（而且从该书编者注释中的介绍看，该报告并未对延边两派群众组织有何褒贬评价的“一面之词”），就把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派”？这岂不是太轻率太武断了吗？是不是因为此前“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而毛远新走后就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大大有损毛远新的“政绩”而使毛泽东恼羞成怒？不管这条批语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背景，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必然会给各级领导人此后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起到示范作用。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把湖南“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的“二四”批示，在毛泽东这个“一·二一”批示之后出现，就不奇怪了。直到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半年之后，全国各地都已在对“二月镇反”中抓捕造反派一事进行平反纠错时，“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才以一贯正确的姿态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¹其实这样的质问可以同样用来对毛泽东：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发出“一·二一批示”呢？

毛泽东误导出来的“二月逆流”

文革中大批判时，认为闹“二月逆流”的老师、副总理们是反对毛主席，而这些老干部们在做检讨时也往往要承认自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之类。其实，“二月逆流”完全是毛泽东误导出来的，是那些老干部们误以为自己是在紧跟毛主席却领会错了“圣意”的结果。

据《毛泽东传》记叙：一些老干部对文革“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江青，指责他们没有报告中央就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说陈伯达打倒陶铸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说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还指责他们“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2月12日，毛泽东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独立王国”，并批评“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²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396页。

² 《毛泽东传（1949—1976）》（下），1480—1481页。

于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或者如古语所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干部就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批评。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批评在先，他们是不会这样表现的，王力后来就客观地总结说“火是毛主席自己点起来的”¹。而且老干部们的发言没有一个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开展文化大革命是他们一致举手表决通过并且衷心拥护的），他们只是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够像以往的政治运动那样“坚持党的领导”，能够“健康发展”。只是因为陈毅言多必失地提到了延安整风，说：“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²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³这话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因为现在被他打倒的刘少奇正是他在延安整风时选定的“接班人”，而他及其“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的至高无上地位，也是通过延安整风确立起来的。王力回忆江青率他们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去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情况时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时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⁴

就这样，一次会议上正常的提出批评意见就成了“大闹”，成了“逆流”。

“二月镇反”的火也是毛泽东点起来的

如同王力所说，“二月逆流”的火是毛泽东点起来的，实际上，“二月镇反”的火，也明明白白是由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和所批发的文件、所掌控的宣传舆论导向点起来的。

“阶级斗争”历来是毛泽东的治国要诀，是他抓的“纲”，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而且抓得更紧。看到全国性的造反、夺权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却未能达到他预期的目标，反而引起更大混乱，各方告急，他必然往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破坏上想，因此，即使目前档案不解密，但仅从已经公开的有关文件、报刊社论文章中即可看到大量“镇反”的号召。这是在“二月逆流”之前从1967年1月中旬就开始不断出现而且越来越密集地出现的。

¹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972页。

² 《王力反思录》978页。

³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236页。另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210页。两书引文中，金著在“刘少奇、彭真”之间无“邓小平”，王著中有“邓小平”。

⁴ 《王力反思录》980页。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这个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镇反”的信号。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对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有的地方将其简称为“二十一种人”）“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明令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其打击面之广，堪称“史无前例”。这个“公安六条”实际上成了“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展开“镇反”的主要“法律”依据。

1967年1月14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1967年1月20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明确宣布：“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这是比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更早（早半个月）的宣布一个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的中央文件，而且是中央四大家联名发出的文件。

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第一条就明令军队：“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是向全军发出的“镇反”动员令（所以后来许多部队领导人在被迫释放抓捕的造反派时都说：抓人是按“军委八条”抓的，放人是按“军委十条”放的）。

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

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¹至今仍不知谭震林的报告中写了些什么，但毛泽东批示的文字十分清楚，矛头是对着下边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等等“牛鬼蛇神”而不是对着上边的“走资派”的。在当时，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就迅速通过传单、大字报传遍全国，尽人皆知，成为镇反的一个重要动员信号。

就在批示谭震林报告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亲自修改审定了将在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等于是指导夺权的“纲领性文件”，社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为什么要夺权（强调革命派同走资派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第二部分讲夺权必须实行革命派的大联合；第三部分讲夺权时要重视发挥革命干部的作用；第四部分讲这次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改组，而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第五部分，也就是社论的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分，专门讲镇反——由此可见，“镇反”已经成为夺权阶段毛泽东的一个重要部署。

社论在这一部分里指出：“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其中，“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系毛泽东审阅社论稿时所加。在接下来列举这些“反动组织”的破坏活动时，毛泽东又在“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之后加了“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²。“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等情况显然是此前毛泽东在各地的告急报告中已经了解到的，现在他把这些都归结为“反动组织”的破坏捣乱了。

社论宣称：“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社论在大段引用毛泽东过去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关对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的论述以后说：“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现在，一批牛鬼蛇神跑出来，搞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之。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当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铿锵有力的反复广播，各地各单位的有线广播不断转播之后，“镇反”的舆论已经深入人心，“镇反”的气氛已经制造得空前浓厚了。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209页。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212—213页

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有关“湘江风雷”的报告作出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¹

1967年2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4日电）已在贵州夺权、掌权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月30日发布的《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共六条，规定“对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对其反动集团指挥部中的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可将功折罪。”“对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幌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镇压。”“对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幌子，组成的专搞经济斗争的组织和流氓集团，一律勒令解散……”这一规定也是全国各大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

1967年2月11日，解放军福建前线三军指战员与“革命领导干部”（省长魏金水等）、“革命左派组织”（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在福州联合召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宣布此前福建红革会一派与一些首都红卫兵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冲击福州军区司令部等行为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部队开始大肆镇压冲军区的一派。《人民日报》2月19日发表了这次大会的报道、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解放军报》2月18日配发的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这一组文章同样由新华社发给全国各大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请不要小看这个“反复广播”，当年还没有普及电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就是最快捷最有力的“红色电波”传来的“北京的声音”。当各地的高音喇叭里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地震响着“正好来一个大扫除”、“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坚决予以镇压”、“一律勒令解散”之类慷慨激昂的宣传时，不难想见那是一种怎样的气氛！

1967年2月12日，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宣布：“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和各地出现了许多所谓全国性组织，他们都不是自下而上地在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在一起组成的。其中，还有极少数组织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搞起来的。”“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他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这些组织，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其成员必须向公安部门揭发报告，由公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此后，所有全国性群众组织都成为“二月镇反”的一个打击重点。

¹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1967年2月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967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宣布：“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

不必再依赖什么解密档案，只需回顾一下这些公开的文件、批示及社论文章，回顾一下当时由“两报一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主导的宣传舆论导向，就不难看出，“二月镇反”完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

其实，当年的造反派也是深深感受到这一点的。当时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求，造反派已经在纷纷进行“开门整风”，批判、“炮轰”自己的错误。他们头上一度被廉价奉送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项虚幻的桂冠已经被置换成了“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不光彩的高帽子。因此，面对这场来势凶猛的“镇反”运动，造反派很少表示质疑，自然也很少进行有力的抵制，更多的倒是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配合：有的采取蜥蜴的“断尾求生”法，把自己认为有问题的人或个别基层组织开除出去，甚至主动将清洗出去的人“扭送”公安机关；有的企图趁机“借刀杀人”，暗中整理好正在与自己的组织打内战的对立派中某些“问题人员”的材料送交公安机关，甚至先于公安机关动手将自己认定的“反动组织”实行抄砸，宣布“取缔”；有的则是在自己的头头或骨干被公安机关抓捕，自己的组织遭到打击之后，高呼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口号，在毛主席像前含泪举行“倒旗请罪”仪式，以表示与那些被抓捕的“现行反革命”和本组织犯下的错误划清界限……而这些举动，在形势变为“反击二月逆流”之后，又都被造反派“选择性遗忘”了，在他们的“战斗历程”中只留下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带镣长街行”之类悲壮事迹的记载。

以公安机关对抓人的态度变化为例

从公安机关在“二月镇反”前后对待抓人（特别是抓捕造反派）的态度变化，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是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统一部署发动的。

在文革初期，重庆有一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本名刘兴泉，文革中赶时髦改了红色名字“刘红”（因“铁道游击队”大名鼎鼎的刘洪深入人心，所以“刘红”也常被写作“刘洪”），当时刘红是重庆市第一建筑公司工人，复员军人。他是重庆工人中最早投入造反运动的，1966年9月初，当一些零星的工人造反者开始在重庆市第六中学碰头聚集，秘密商讨建立造反组织的时候，刘红就已经随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赴京告状人员去了北京。回到重庆后，11月13日发出了署名“刘红执笔”、以“重庆赴京工人战斗组返渝人员”名义写的《重庆赴京工人战斗组返渝公报》，并在造反派红卫兵支持帮助下为首组建了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这是当时重庆市较早的全市性跨行业工人造反组织。刘红就成了“刘司令”。但因其在北京上访期间多次聚众冲击中南海、天安门金水桥和殴打值勤解放军战士，以及当上“司令”后进出坐小汽车，经常带着保镖和女秘书招摇过市，进出饭馆酒店大吃大喝等“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引起重大八一五单纯的大学生们反感，他们一调查，又了解到刘红的父亲有“历史反革命”、劳改犯等问题，其本人也因“盗窃国家财产”、“投机倒把”而在1962年被原工作单位开除等劣迹。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组认定其为混进群众组织的“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为防止其败坏造反派的声誉，大学生们说服了二七战斗团其他负责人（多是唯重大八一五马首是瞻的青年工人），于1966年12月15日将刘红从他参与创建的二七战斗团开除。但刘红旋即另立山头，成立了“重庆工人二七革命造反委员会”继续活动，并加入到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的行列中。重大八一五总团负责人秦安全为此专门带着几个红卫兵，于12月下旬的一天到重庆市公安局，提出将刘红逮捕的要求。公安局副局长罗让和技侦处处长王成林接待了他们。后来王成林在回忆录《重庆“砸烂公检法”亲历记》中专门写到了此事：

秦口述刘洪所做桩桩坏事，既具体又有理有据，看来，他们对刘洪调查研究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侃侃而谈，我们洗耳恭听，边听边想：秦要求公安局处理刘洪，是真心诚意，还是因派别之间的矛盾？

我们听秦安全讲完刘洪的问题，对他们专程来反映刘的情况表示欢迎和理解，但是，根据经毛主席同意，中共中央1966年8月22日批准转发的公安部的报告中“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的规定，说明现在不能立即

处理刘洪的道理。由于各执己见，争论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四时，最后我们提出，请他们回去后，把今晚所谈刘洪问题专门整理一个材料交我局，以便按《十六条》精神，留待运动后期处理……¹

重庆市公安局的领导人当时向红卫兵提到的这个公安部报告，指的是《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966年8月22日以中发[66]410号文件下发，其中提到了“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重庆被点了名），文件中明确规定，除了那几种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重大八一五和二七战斗团的新领导层自然不能容许刘红继续在外招摇，经过研究策划，1967年1月7日，二七战斗团总部组织人马抄砸了刘红的组织，并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将刘红扭送公安局。公安局还是副局长罗让和技侦处长王成林出面接待，他们本不愿（也不敢）接收这个被“革命群众”扭送来的“现行反革命”，但被纠缠轰闹十多小时后，到次日凌晨5时，被迫答应将刘红“暂留”在公安局。²

请注意：重庆市公安局这个不敢抓人（而且是造反派自己抓了送上门来的“坏人”）的态度，与后来“二月镇反”中大肆抓捕造反派的态度相比，不是反差太大了吗？其实，这里反映出来的，正是毛泽东的态度变化。从不准公安机关干涉学生运动而规定“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到抛出“公安六条”、“军委八条”，发表《红旗》三期社论号召镇反，鼓吹“正好来一个大扫除”，欢呼福建前线部队“粉碎反革命逆流”等等，正是在毛泽东这种新的部署下，各地公安机关才奉旨转向，在“二月镇反”中积极行动起来，放手抓捕造反派。

有人会问：既然“二月镇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求各地放人、平反、做检讨，弄得各地积极开展“二月镇反”的驻军和公安机关下不了台？其实这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毛泽东翻云覆雨的政治需要。“伟大领袖”的这类表演，在文化大革命中难道还不够充分吗？

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反复旧”。

1968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当年第四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文是由姚文元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写好后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审定时将原排在第四篇的此文移作头一篇，足见其

¹ 王成林《重庆“砸烂公检法”亲历记》，自印书，2003年10月，94—95页。

² 《对政治扒手——刘红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载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主编《2·7战报》创刊号，1967年1月30日出版。

对此文的欣赏与重视¹。在这篇社论中，有这样一大段文字：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这篇社论发表后，从1968年底到1969年初中共“九大”前后，山东、黑龙江、湖北、四川等许多地方和北京的一些中央与国家机关，都陆续掀起了以“反复旧”为名的新一轮造反浪潮，眼看“九大”所宣传的文革“大好形势”又要因新的动乱而泡汤（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内幕原因），毛泽东变卦了，又用他那套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手法，斥责下边一些闹“反复旧”闹得厉害的地方，逼着那些领导人和“新生红色政权”中的“革命群众代表”做检讨甚至下台换人。最为荒唐的是，毛泽东还发出了这样的“最高指示”：“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²

这不是公开耍无赖吗？照此逻辑，我们可不可以说“反走资派必出走资派，反走资派就是走资派”、“反修必修，反修就是修”？

2016年5月2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故纸堆】

有关重庆“二月镇反”第一案

“前哨支队”案的三篇资料

渔歌子 选编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580页注2。

²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1969年12月27日。其中康生的讲话里说：“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什么叫‘反复旧’：‘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版。

说明：重庆文革中1967年的“二月镇反”，是从镇压“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开始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是一个庞杂的全市性、跨行业、多山头的群众组织，它有四个各自独立、互不买账的较大山头：司令部、总部、一支队、二分团。其中，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蒋国志、李方成）由1966年10月造反军北上告状之后留守重庆的人员组成，造反军总部（主要负责人黄廉）是11月北上告状返回重庆之后的人员不愿服从司令部领导而另立的山头，造反军一支队（主要负责人朱登明）是造反军北上告状第一连（以市中区建筑修缮联合社工人为主体的）在北京上访期间因与黄廉等人发生矛盾而单独组成的，造反军二分团（主要负责人杨大渝，以人交公司职工为主体）原是司令部下属组织。因与司令部头头闹矛盾（曾想夺司令部的权未遂）而拉出队伍独立活动。1967年“一月夺权”时，因对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产生意见分歧，造反军司令部、总部、一支队均站到了反对革联会一边，二分团则站到了支持革联会一边。因革联会得到驻军支持，被认定为“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反对革联会就被认为是反军和破坏文化大革命，重庆由革联会主持开展的“二月镇反”，就带上了强烈的派性倾轧色彩（这也是许多已经夺权的地方开展“二月镇反”时的一个明显特点）。

“前哨支队”属于造反军总部，是重庆市市中区临江门（文革“破四旧”时改名为前哨街）的一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因中共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社会等级身份差别，街道居民包括街道小工厂（时称街道工业）、街道运输队、街道修缮队等小单位的人员及临时工、无业人员（包括不被社会承认的个体劳动者）等等，大多有“家庭出身”或自身“历史”、“社会关系”等各种“问题”，处于社会低层或边缘，被一些当权者视为“社会渣滓”，因此在“二月镇反”中成为首当其冲的清理重点，许多地区都以街道上的造反派组织为“镇反”的首选打击目标。

对于处理重庆这个“二月镇反”第一案，当时公安机关十分谨慎，在抓捕其第一个人（已经被该支队开除）之前，还征求了造反军总部的意见，得到同意后才着手进行。在“镇反”之初，造反派（即使是反革联会一派）内部大都认为“前哨支队”确有问题。直到“反击二月逆流”之后，掌握专政大权的有关方面仍然坚持认定“前哨支队”没有整错，拒不平反。“二月镇反”是应该“全盘否定”（包括为“前哨支队”翻案平反）还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又成为重庆两派分歧的焦点之一。这里是有关此案的正反两方面材料。

《新重庆报》关于镇压“前哨支队”的报道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坚决镇压反动组织“前哨支队”

市革联会召开了揭发、斗争、处理反动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大会，公安部门依法逮捕这个反动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

说明：本篇原载《新重庆报》1967年2月23日第3版。《新重庆报》即原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1966年底报社造反派夺权后，限令《重庆日报》停刊，从1967年1月1日起改出《新闻报道》，1月底重庆市造反派夺权建立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后，《新闻报道》又从2月1日起更名为《新重庆报》出版发行。

此报道后边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被斗争的“反革命分子”最后“由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立即依法逮捕”，这里记载了一个“二月镇反”中十分普遍而离奇的现象，即当时各地公安机关已经由打着“造反”旗号的群众组织（有的是造反派，有的并非造反派）夺权，在“二月镇反”中，这些执掌公安机关大权的群众组织代行了原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也就是说，这次“镇反”是由公安机关掌权的群众组织出面对社会上的某些群众组织和群众实行专政。当时因为各行业各单位都在夺权，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质疑。

本报讯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昨天上午，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解放碑召开了揭发、斗争、处理临江门（现叫前哨街）地区反动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大会。本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近五万人，愤怒斗争了这个反动组织中以反革命分子田树堂、许洪烈、钟守德、王阳臣、郎以诚、丁俊臣等为首的一小撮坏蛋。会上，群情激愤，革命群众振臂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坚决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只许革命左派造反，不准牛鬼蛇神翻天！”

在斗争大会上，重庆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市中区人委红旗造反团《冲锋》战斗队、四川外语学院红卫兵团八·二六战斗团、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重庆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和临江门地区革命群众的代表一致表示：坚决拥护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决定，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打击、镇压一切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击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代表们还在会上愤怒地揭发和控诉了反动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的滔天罪行。这个反动组织中以田树堂、许洪烈、钟守德等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打着“造反”旗号，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纠集一伙牛鬼蛇神，蒙骗一部分群众，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为大批牛鬼蛇神“平反”翻案，敲锣打鼓给这些牛鬼蛇神送所谓“平反”大红喜报，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欺骗、煽动一些群众，以“抄黑材料”为名，多次冲进公安机关，非法搜查派出所办公室和民警宿舍，抢走机密档案、文件和民警帽徽、领章、皮带等物，并残酷斗争、殴打公安人员，疯狂进行阶级报复。这些反动家伙还疯狂地叫嚣：“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不是你们的天下，非把派出所整倒不可……”他们还任意破坏国家财产，打烂临江门小学的门窗、书桌、凳子等家具。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激烈斗争中，这些家伙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非法夺取前哨（临江门）街道办事处公章，宣布办事处的一切权力归他们所有，并乘机大搞经济主义，滥发救济、补助，为牛鬼蛇神安插工作。无数铁的事实表明：“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从成立以来，打着“造反”旗号，干尽了坏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组织。对于田树堂、许洪烈、钟守德等一伙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是要坚决镇压。正如《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所说：“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代表在会上讲话时，表示坚决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示，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坚决镇压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谁要是胆敢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将它消灭掉。各革命组织的代表在发言时，严正警告那些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蛋，如果不赶快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投降，决没有好下场。

在大会宣布根据革命群众的要求，由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立即依法逮捕罪犯田树堂、许洪烈、钟守德、丁俊臣、郎以诚、王阳臣，拘留主世荣、张明卿、冯蜀川，将肖静、刘春淑交群众监督管制以后，人心大快，大家不断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斗争大会结束后，田树堂、许洪烈等一小撮坏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民警押上汽车，游街示众。

~~~~~☆~~~~~

## 《新重庆报》关于镇压“前哨支队”的社论

## 扫除一切害人虫！

说明：本篇原载《新重庆报》1967年2月23日3版。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对反动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进行坚决镇压，把反革命头目田树堂、许洪烈等依法逮捕，这一决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时刻，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美蒋特务、社会渣滓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动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前哨支队”，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动组织。这个反动组织的混蛋头头，打着“革命”的旗号，披着“造反”的外衣，欺骗、煽动一些群众，多次冲击公安部门，抢劫档案机密；非法斗争公安人员和地段干部，进行阶级报复；公然为牛鬼蛇神翻案，妄图反攻倒算，并且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夺权。他们干尽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反动组织“前哨支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伪军官、伪警察、地痞流氓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分子的家属等乌七八糟的人的黑窝子。这些坏家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性，聚集党羽，网络社会残渣，结成死党，专门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重庆地区解放前是蒋介石匪帮长期统治的老巢，又是全国较晚解放的地方，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残渣余孽为数不少，加上黑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一批牛鬼蛇神保护下来，因此重庆地区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每当阶级斗争处于关键时刻，一小撮牛鬼蛇神总要爬出来登台表演一番，总要和我们较量一番。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他们更认为有机可乘，干脆撕下面具，赤膊上阵。特别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的紧要关头，他们更是十分嚣张，妄图制造混乱，猖狂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阶级敌人总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其实正好暴露了他们反革命嘴脸。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我们正好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不管阶级敌人赤膊上阵也好，乔装打扮也好，都逃不出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说：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



矩，不许他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重庆市“革联会”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反动组织“前哨支队”进行了坚决镇压，取缔这个反动组织，这一行动好得很！革命人民无不拍手叫好。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行动起来，取缔一切反动组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于反动组织的头目，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对于那些受蒙蔽而参加反动组织的一般群众，我们要大喊一声：必须迅速觉悟过来，擦亮眼睛，分清敌我，和反革命头头划清界限，毫无保留地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将功补过，向真理投降，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造反不分先后。尽快地站到革命派一边，大杀回马枪，将反动营垒杀个人仰马翻，片甲不留。

重庆市“革联会”，担负着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使命。我们革命派夺回了政权，就要行使政权，最重要的就是行使专政大权，因此我们要大树“革联会”的无产阶级权威。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巴黎公社把权威运用得太少的历史教训。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把枪杆子，刀把子掌得牢牢的，用枪杆子来保卫印把子。只准左派夺权，不准地富反坏右翻天！

我们要在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同时，严防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一切革命的组织，都应积极行动起来，把那些打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别有用心的混蛋，统统清洗出去，对他们实行专政；一切革命的同志，在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前，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书生气十足，不要被坏人利用，严防阶级敌人打入革命队伍中来，严防敌人挑拨离间，制造事端，捣乱我们的阵线，挑起革命造反派内部的混乱。

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把那些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依法逮捕！把那些阴谋破坏交通、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依法惩处！把那些将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欺骗、煽动群众冲击军事机关的幕前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严加查办！把那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再次警告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否则，就砸烂你们的狗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反到底派对“前哨支队”案的调查报告

渔歌子 录入

说明：本篇原载重庆反到底公安红一方面军主办《公安反到底》报第五期，1967年12月11日出版。

对《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的 初步调查报告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是前哨地区街道居民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在今年元月十二日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一日就被非法革联会和公安局“临委会”明令宣布为“反动组织”，进行了取缔。是重庆市“二、三月镇反运动”中最早被打成的“反动组织”。处理时，在解放碑召开了近五万人的群众大会，宣布逮捕拘留十一人，管制二人，劳教一人，勒令登记自首七十二人，共打击处理八十六人，占成员总数（一百五十四人）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八。大会后，被五花大绑，戴着手铐，挂着黑牌，进行了三天游街示众，同时，大街小巷贴满了由非法“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和公、检、法“临委会”取缔这个组织的布告、通令。《新重庆报》二月二十三日为此还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消息，发表了社论，接连几天还登载了一些群众组织的声讨文章，大造声势，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红十条》、《红五条》下达以后，前哨支队至今没有得到平反。还有九人没有释放，被管制劳教、拘留、登记自首的人没有平反和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于九月十日致函省革筹，省革筹组接待室于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又分别致函重庆警司和市革筹组（见附件），明确指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就应报中央批准。如果不是反革命组织，就应坚决执行中央政策，进行平反。被关未放的人如果不是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应予释放。”根据中央和省革筹对此案的指示，反到底公、检、法指挥部于十月十七日致函重庆警备区和市革筹（见附件），建议组织两大派代表迅速复查此案，但迄今未得答复。不仅如此，前哨支队一案，至今仍被山城某些人士标榜为“二、三月镇反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的一张“王牌”。作为对抗《红十条》、《红五条》，抵制否定“二、三月镇反运动”的挡箭牌。我们

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红十条》、《红五条》，对党，对革命，对人民负责，我们对前哨支队案进行了调查，现将初步调查掌握的情况汇报于后：

一、前哨支队成员的政治情况

非法“革联会”和公、检、法“临委会”的布告和通令中说：“这个组织以反革命分子田树堂、许洪烈为首，纠集一伙牛鬼蛇神……”“这些人中，社会渣滓和牛鬼蛇神共八十一人，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六”。非法“革联会”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向山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汇报”材料中，更是胡说什么“前哨支队七个头头，全是五类分子……”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经过初步调查，《前哨支队》原有五个负责人，具体情况是：

（一）总负责人田树堂，男，三十九岁，贫民出身，是一个木工。解放前参加过伪自卫队，为一般队员。一九四九年同别人合伙，转手贩卖过小量银元。五一年参加工会，五四年调大洪河水电站当临工，五八年自动辞职回家。以后一直在街道做木工，有时自产自销木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情八·一五观点。九月份保守组织“思想兵”认为他搞单干，贴他的大字报，发生争执，被抄家斗争。

（二）支队长许洪烈，男，四十岁，其父许学源，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任湖北教育司代理司长，一九三七年在湖北孝感当过三个月的伪县长。一九四五年任重庆参事室设计员，同时在求精商学院教书，有时行医。解放后在文史馆工作。许洪烈本人，一九四五年考入伪海军当学员一年，后在上海当店员和在伪上海市政府当雇员一个半月，一九四六年通过其父亲的朋友在上海宪兵二十三团挂了个名，领过一个月的工资，就回重庆了。一九四七年后在重庆陪都广播电台任广告广播员等职。解放后，考入海军，一九五二年被资遣，一九五三年到地质学校学习，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一年，先后在四一三勘探队和六〇一矿工作，一九六一年辞职回家，后做临工。一九六六年十月，被“思想兵”抄家斗争。二月一日已退出《前哨支队》，同时被《前哨支队》宣布开除。

（三）副支队长张明卿，女，五十七岁，贫民出身，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退伍的旅长周世全用四百块钱买去作妾，一九四二年周病死，一九四四年同现夫冉子由结婚。冉解放前后均为打铁工人，曾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到射洪老家探亲，经一个在伪县府工作的亲戚介绍，在该县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看守。解放后未受过处分。张明卿本人，一九六〇年以后当过锉刀厂厂长，六〇年、六一年，还先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被选为区人民代表。

（四）政委刘春淑，三十三岁，出身自耕中农，其父曾当过伪甲长，五一年与田树堂结婚，先后在食品公司、专卖公司、日杂品公司作临工，现理家。

（五）宣传负责人肖静，女，二十八岁。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在湖南省歌舞团当儿童演员，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调湖南第一纺织厂当工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先后在四一三勘探队和六〇一矿为工人，六一年同丈夫许洪烈一起回家。现理家。二月一日，同许洪烈一起退出《前哨支队》。

上述五人，许洪烈有些政治历史问题，有的过去有些错误，但都不是什么“五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而且许洪烈、肖静早于二月一日已不属于《前哨支队》成员。但在取缔《前哨支队》时，还把他们作为负责人，这是别有用心的。

被打成牛鬼蛇神社会渣滓的八十一名一般成员中，具体情况是：

（一）没有发现政治问题的革命群众三十二名，其中学生八名，如王四容，男，二十二岁，家庭出身下中农，川外八·二六战斗团成员，重庆造反派市平反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今年一月被派到前哨街地区搞平反，由于支持和参与了《前哨支队》的革命活动，就被打成了《前哨支队》的“幕后指挥”，横遭逮捕。又如杜尚禄，男，十五岁，出身小商，初中学生，元月二十四日申请参加《前哨支队》，就被作为牛鬼蛇神，勒令登记自首。

（二）本人或家属有些政治历史问题或犯过某些错误的人民群众二十五名。

（三）有各种政治身份或受过刑事处分的二十四名，占《前哨支队》成员的百分之十五点六，其中，未戴帽地主一名，反动党团骨干一名，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三名，刑满释放的八名（内反革命一名，烟毒犯四名，盗窃犯一名，赌博一名，婚姻一名），反属十一名。上述人员中的一部分人，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对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表现暂时无法搞清，是否按“公安六条”规定对待，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尚有待进一步查证。

二、关于《前哨支队》为牛鬼蛇神“翻案”、“平反”的问题

市公安局“临委会”的布告中说：二月一日召开牛鬼蛇神参加的“平反”大会宣布“平反”名单，敲锣打鼓给牛鬼蛇神送大红喜报……在“平反”的这些人中，有“五类分子”、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敌伪军政警宪人员、反革命、坏分子家属、刑满释放、解除管制等共七十三人。

我们调查，事实的真相是：中央军委“平反”指示下达后，李任死党及其一小撮同伙拼命抵制，负隅顽抗。这时，革命造反派市平反监察委员会派王四容来到前哨地区，组织革命群众学习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开展了平反工作。

元月二日和八日，王四容先后两次召集前哨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争和抄家的群众学习和讲解有关中央指示和平反政策，均强调凭选民证出席。会上要求平反的有一百三十六人，为了不致平错，组织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调查小组，并同派出所联系，派出所给他们开了四十五名五类分子和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名单。经

过调查和与派出所开的名单核对，确定平反九十七人（王四容坚持平反一百零七人但都没有派出所开列的四十五人），元月三十一日晚，田树堂、刘春淑等五名代表，持平反名单到派出所征求意见。在各段户籍民警参与审核下，除少数有异议外，认为都可以平反。但所长冯大成请示市公安局“临委会”后不同意平反。在这种情况下，二月一日，由市平反监委和《前哨支队》主持，召开了平反大会。会后，以平反监委流动小组和《前哨支队》的名义，给平反的人送了喜报（实际上只给九十一人送了喜报）。

奇怪的是，市公安局“临委会”一方面不同意市平反监委和《前哨支队》研究确定的给九十七人平反，并诬蔑他们为牛鬼蛇神翻案，另一方面当二月一日平反大会以后，却指示派出所敲锣打鼓，送大红喜报，单独给九十七人中的田树堂、刘春淑、何永富等十人平反。更为恶毒的是，不到二十天时间，市公安局“临委会”把经过他们平反的十人又重新打成“反革命”，从中逮捕一人，管制一人，劳教一人，勒令登记自首二人，至今仍未释放和平反。

例如，何永富，女，因男女关系问题，去年十月被市公安局批准劳教三年，今年元月二十七日，市公安局“临委会”决定把何放回，并指示派出所敲锣打鼓，送大红喜报，给何平了反。后来何参加了《前哨支队》，市公安局“临委会”又于今年三月十一日将何戴上“坏分子”帽子，送去劳动教养三年。

市平反监委流动小组和《前哨支队》给平反的一百零七人，经对其中九十一人的调查，有敌伪军政警宪四人，刑满释放六人（烟毒犯四人，盗窃一人，赌博一人），贩毒撤销管制的一人，资本家一人，反属十人，其他六十九人都属于基本群众，其中有些本人或亲属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或错误，但绝不是牛鬼蛇神。

综上所述，市平反监委和《前哨支队》平反工作的大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由于政策水平不高，没有经验，单纯认为有选举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争处理过的都该平反。因而有一些人是不应平反的。也给平了反。但这只是认识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可以通过帮助教育加以纠正。

三、关于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抢走机密档案和非法斗争殴打公安人员的问题

市公安局“临委会”的布告中说：一月二日，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五日，田树堂、许洪烈带领人员三次冲击派出所，抢走档案和机密文件。布告中又说：一月二日，他们冲进前哨派出所，诬蔑所长冯大成是“打人凶手”，拉到解放碑……控诉斗争……。

经过调查，事实真相是：

今年元月二日，首都三司和一司的学生孟宪成、林志成发现保守组织“思想兵”给派出所送的感谢信，于是到派出所要拍照，田树堂也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

派出所长冯大成不许照，发生了争执，声援人员陆续前来，在造反派的声援下，终于拍照了感谢信，而且还冲上楼拍照了“思想兵”的介绍信，在这一过程中，二十九中“思想兵”王某某把田树堂打伤住院，激起群愤，于是当晚将冯大成扭至解放碑批判斗争，会议由林志成和财贸八一五负责人王绍川（后为非法“革联会”常委）等主持。这完全是革命行动，是无可非议的。而市公安局“临委会”却诬蔑是“冲击公安机关”、“非法斗争、殴打公安人员”完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哨支队》是元月十二日成立的，这一事件发生在《前哨支队》成立之前十天，主持斗争大会的是首都三司、一司的学生和财贸八一五的负责人王绍川，与《前哨支队》并无关系，但市公安局“临委会”为了把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前哨支队》的身上，却卑鄙的在布告中把《前哨支队》成立的时间篡改为元月二日，同时，元月二日的所谓“冲击派出所”和“把派出所长冯大成拉到解放碑控诉斗争”，本来是一个事情的前后继续，而市公安局“临委会”却玩弄阴谋诡计，把这个事件分割开来，在布告中列为两条罪状，用心何其毒也！

由于前哨街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当权派，拒不给被打成反革命和错斗争的革命群众平反，拒不交出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因此，元月二十三日，由王四容、田树堂、李坚等代表前哨街地区八个革命群众组织，汇同前哨街派出所内部刚杀出来的造反派负责人徐某某一起研究，组成两个组，前往派出所抄黑材料。

第一小组，由王四容负责抄档案室，有户籍民警陈某某、彭某某、本市学生八人，和西安交大学生两人参加。第二小组由姚锡林（红色八一五负责人）负责抄办公室，有户籍民警徐某某，红色八一五学生十五人参加。在抄查过程中，有的户籍民警主动提出，为了不致遗漏，可以到民警寝室查抄。于是，又临时组成一个小组，由田树堂负责，有学生两人和冯蜀川、户籍民警王某某参加。

在查抄档案时，除去撕去五月十六日以后整理的黑材料约五十页外，民警牛某某当时亲自交给田树堂六卷事前用铁丝捆好的材料。回去后，这些材料全由王四容锁在箱内。二月四日晚，王四容初步审查过一次，发现有五类分子袁子清等四人的材料，准备清完后送回。但二月五日，就被市公安局“临委会”负责人章志鉴带领武装人员全部拿走了。布告中所谓抢走机密档案一千零九十五份，纯属歪曲。

元月二十五日，《前哨支队》由许洪烈、刘春淑等带领二十余人声援红旗路派出所革命群众批判斗争该所指导员和社教工作团团长。会议进行期间，红旗路革命群众抄了派出所的黑材料。许洪烈等人根本未参加他们抄黑材料的行动，当天曾有红旗路派出所户籍民警李某某交给陈仲元（学生）一卷东西，户籍说“是社教工作团搞的你们的黑材料”。陈事后交给了四德村平反监察小组成员李一琴、

谢松柏等人（谢为前哨支队成员），李、谢又转交给王四容。可见对抄红旗路派出所一事，是强加于《前哨支队》的莫须有罪名。

四、关于夺权问题

市公安局“临委会”布告中说：一月二十日，他们伙同其他组织，由田树堂、许洪烈带领，非法夺取了前哨街办事处公章、宣布办事处的一切业务活动，都要受他们的监督。是非法夺权。

事情的经过是：

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前哨街地区革命群众为了响应毛主席大联合大夺权的伟大号召，元月十五日，《前哨支队》发出了联合夺权的倡议，得到了前哨街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响应，于当晚有《一二·四战斗团》、《银星纸盒厂八·一五》、《反修兵团》、《前哨支队》、《红色八一五》、《小闯将》的代表，及平反监委工作人员王四容在临江门小学开会，商讨了夺权事宜。会议决定，各战斗队按巴黎公社选举一至二名代表成立临江门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点，十九日正式召开联络点成立大会。会上有代表反映派出所印袖章，可能要组织保守势力搞假夺权，建议提前行动。因此，研究决定元月二十日夺权。

元月二十日前哨街地区八个革命群众组织选派代表联合夺了街道办事处的政、财、文大权，夺权后各革命组织立即互推了王四容、李坚、田树堂等三人暂行职权。除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书记外，其余副主任等六个干部照常上班。

这个夺权是完全正确的，合法的。布告中所谓“非法夺权”其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反对革命造反派夺权。

五、关于破坏国家财产问题

市公安局“临委会”布告中说：“二月三日，该支队许洪烈和田树堂等人发生矛盾，许洪烈带领一伙人到临江门小学，打烂小学门窗、书桌、凳子等家具四十多件”。经调查，市公安局“临委会”把该校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损坏的桌椅全部算在《前哨支队》的账上，恶意扩大事实。特别是许洪烈当时已被《前哨支队》开除，许同田树堂之纠纷、斗殴，本属少数人之纠纷，但市公安局“临委会”却作为一个组织的罪状，充分表明他们政治上的空虚。

六、《前哨支队》的主要活动和被镇压的情况

《前哨支队》从一月十二日成立，实际上到二月五日已被压垮，从成立到被压垮只有二十多天时间，在这段时间，他们根据当时全市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平反

指示，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平反，和查抄黑材料，并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进行了大联合夺权。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斗争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混入了一些政治不纯分子，但发现后，都作了清理。如：发现沈蓬是劳改释放犯，就立即清除出队。“公安六条”公布后，还准备通过整风来整顿组织。但没有来得及进行，就被镇压了。

市公安局“临委会”不择手段镇压《前哨支队》，是为了打垮十余万人的“革命工人造反军”，进而全面铺开“镇反运动”。二月五日，市公安局“临委会”就匆忙决定将许洪烈逮捕起来。二月七日，临委负责人章志鉴亲自率领一百三十余人的庞大“专案组”（内公安干警五十多人，学生组成的“打鬼队”八十多人），经过十多天的草率“调查”，就把《前哨支队》打成了“反动组织”。于二月二十二日开五万多人大会公开处理。为了进一步血腥镇压造反派，非法“革联会”又决定判处田树堂死刑，立即执行。王四容判二十年徒刑，其他被捕群众，分别判处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并派专人送材料到省审批。

特别恶劣的，市公安局“革委会”怕二、三月“镇反运动”的这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公开布置原《前哨支队》成员，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允许，不准向任何人反映情况。组织“打鬼队”，经常到前哨街地区游转，进行控制威胁。使我们调查工作遇到严重困难，重重障碍。与此同时，市公安局“革委会”和有关方面至今仍到处作报告，叫嚣：“前哨支队是地地道道的反动组织，谁也翻不了”，企图继续为自己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开脱罪责。

七、处理意见

根据我们初步调查情况，提出以下意见：

（一）坚决执行《红十条》、《红五条》的规定，给《前哨支队》认真平反，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应一律释放，被错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应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平反，恢复名誉，肃清流毒。

（二）对镇压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党内走资派，及市公安局“临委会”、“总部”中一小撮坏头头，应按“公安六条”依法查处。

重庆反到底革命派

公检法指挥部、政法兵团联合调查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公检法指挥部就组织复查〈前哨支队〉案件一事致市革筹组、警备区的公函》、《关于处理〈前哨支队〉许洪烈情况回忆》、《关于镇压〈前哨支队〉的办案经过》、《重庆市公安局处理何永富的情况》四件，略。）

【故纸堆】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

渔歌子 录入

说明：本篇原载 1967 年 2 月 5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贵阳四日电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出现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把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但是，最近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其领导权，欺骗和操纵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冲击我人民解放军，抢劫枪支弹药，盗窃国家机密，搞反革命复辟。鉴于这种情况，特作以下规定：

一、对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必须立即逮捕法办。

二、对其反动集团指挥部中的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可将功折罪。

三、参加反动集团的小头目，凡自动投诚登记，不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四、对被牛鬼蛇神操纵的组织中受蒙蔽欺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使他们迅速觉悟过来，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坏蛋彻底决裂，团结在革命造反派的周围，对那些坏蛋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五、广大革命群众应该牢记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对待所有群众组织及其行动，保证把群众组织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革命左派手中，坚决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牛鬼蛇神，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凡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和反对。

六、对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幌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镇压。

对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幌子，组成的专搞经济斗争的组织和流氓集团，一律勒令解散。如若拒不解散，革命造反派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故纸堆】

山东“二月黑风”中抓人情况

渔歌子 摘录

录入者说明：本篇摘录自（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主办《鲁迅大学》（铅印小报）第35期（1967年12月17日出版）第三版刊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轰炸队文章《欺骗中央，铁证如山，休想抵赖！》。当年在“新生红色政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镇反”被称作“二月黑风”。“鲁迅大学”即山东大学在文革初期改的名字。

仅在“一·三一”镇压“山工联”（注：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简称）现场，他们残酷毒打革命工人、学生，逮捕近三百人，其中六十余人五花大绑。他们手中的登记簿，我们手中的名单，革命工人遭到的摧残，就是铁证。

在山东全省，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总计逮捕、拘留七千人以上。例如：济南三千余人，菏泽专区一千一百余人，济宁专区六百一十四人（其中正式逮捕、拘留四百零八人），淄博专区三百六十余人，高唐县（我们手中有名字的）十五人。

【故纸堆】

涪陵军分区为“二月镇反”受害者发布的平反公告

罗成胜 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罗成胜著《我的造反生涯——重庆涪陵忠实兵总负责人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涪陵在文革时是四川省的一个专区（今属重庆市）。在该书中所录的这份名单前面，作者有一些说明——

“据之后的统计，在整个‘二月镇反运动’中，涪陵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就达四千多人，而（地委、专署所在地）涪陵县就抓了一千多；在被抓进监狱的人中有共产党员、机关干部、有工人、农民、城市居民、教师、学生，甚至有十二三岁的小学生；至于被批被斗被迫检讨认错的人比这个数不知要多出好多倍。”

“1967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涪陵军分区发布了一个平反补充公告，公布了在当年‘二月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及抓进监狱的855个‘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不过其中仍有遗漏，比如我当时所在的涪陵一中，除了名单中的五人（罗成胜、石少云、冉武洪、邓西北、何友哲）外，还有何介眉（教师）就没有上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名列前茅的五人，就是当年4月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从监狱里直接接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涪陵造反派代表。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涪陵军分区平反补充公告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我们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赋予我军“三支”“二军”光荣任务的时候，军分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了进一步彻底肃清军分区个别负责人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恶劣影响，除十月七日已发平反公告外，特补充公告如下：

在“二月镇反运动”中，还通过“整风”，“口头宣布”等手段，把“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所属战团（队）、“海陵工人二七战团”所属分团、“红卫兵涪陵部队”、“小教联合造反团”、涪一中的“11·2战斗团”、电影训练班的“红影造反团”、专区气象台的“井冈山战斗队”、专区防疫站的“战旗造反团”、专署的“火箭造反团”、“彻底革命造反团”、“红鹰军”、川剧团的“红艺军”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现郑重宣布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被非法逮捕、拘留、关押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给予彻底平反，名单如下：

| | | | | | | |
|-----|-----|-----|-----|-----|-----|-----|
| 马泽林 | 罗成胜 | 石少云 | 吴大才 | 李林森 | 洪 孟 | 冉启凤 |
| 李光荣 | 童新民 | 刘知群 | 喻建忠 | 夏发云 | 陈启贵 | 陈万全 |
| 祖家富 | 刘寿林 | 王永禄 | 吴太德 | 谭华忠 | 刘国洪 | 谭书明 |
| 徐卓云 | 余德木 | 陈国嘉 | 张必双 | 蒋长明 | 石登娥 | 周友谊 |

| | | | | | | |
|-----|-----|-----|-----|-----|-----|-----|
| 周兴堂 | 胡文明 | 李增弟 | 李德玉 | 王光明 | 龙升云 | 向泽民 |
| 张永兴 | 李煜 | 冀宇宙 | 钟胜龙 | 刘永寿 | 易宗培 | 刘代凡 |
| 黎天华 | 余俊卿 | 夏宗江 | 吕洪臣 | 王华儒 | 潘正明 | 谭锡明 |
| 吴仕杰 | 钱通生 | 苏延安 | 秦大银 | 毛福华 | 赵发茂 | 何文秀 |
| 周泽明 | 王庆 | 何学琼 | 刘兴伦 | 邓世君 | 况小莲 | 古秋顺 |
| 刘俊芳 | 刘梅芳 | 李振华 | 孙世超 | 吕希新 | 杨集华 | 白朝忠 |
| 何伦模 | 夏祖文 | 梅素华 | 周登娥 | 谭章秀 | 王货存 | 古其正 |
| 陶如海 | 徐民钧 | 杨位显 | 刘成发 | 黄顺华 | 陈兴淑 | 吴素芳 |
| 况守才 | 蒋礼国 | 袁文 | 李志学 | 廖光涵 | 刘明权 | 田景瑶 |
| 许天仁 | 李泽江 | 刘光惠 | 夏道胜 | 文新民 | 伍茂发 | 陈朝昌 |
| 向茂荣 | 况刚仁 | 何治伦 | 吴天明 | 谢伯宣 | 倪柏煜 | 肖诗建 |
| 肖跃学 | 丁建华 | 何龙江 | 黄晏仲 | 冉俊才 | 冉树奎 | 冉从才 |
| 邓绍华 | 谢礼信 | 张勤操 | 况世才 | 胡光平 | 陈绍余 | 黎德钧 |
| 王承淑 | 张天秀 | 黄乾珍 | 王寿碧 | 谭礼尤 | 杨柏林 | 江兴发 |
| 冉武洪 | 邓西北 | 何友哲 | 冉鼎 | 田维云 | 熊常德 | 郭美刚 |
| 戴安明 | 罗荣远 | 况太志 | 王俊池 | 朱学明 | 谭书荣 | 韩最新 |
| 杜肇豫 | 冯德彬 | 江绍荣 | 吴厚德 | 邓亨连 | 张天福 | 雷天钦 |
| 况明宏 | 田松柏 | 汪同华 | 潘应松 | 王元生 | 王道南 | 夏明远 |
| 周正中 | 雷永志 | 常文国 | 黄开运 | 徐行 | 肖显忠 | 施成烈 |
| 秦中寿 | 田宗孝 | 金广儒 | 徐银古 | 章锦标 | 王淑珍 | 章锡南 |
| 唐永章 | 陈明焕 | 杜凌云 | 吴一鹏 | 陈任申 | 陶彩凤 | 张章元 |
| 沈忆英 | 张熊 | 董金木 | 蒋廷富 | 李新维 | 薛德成 | 徐远彬 |
| 但永丰 | 姜拥军 | 张永昆 | 刘彬 | 张官德 | 朱生全 | 白羽峰 |
| 李长胜 | 王仲尧 | 陈德贵 | 夏昌发 | 李正谷 | 刘顺国 | 蔡其胜 |
| 卢中祥 | 黄尚志 | 刘多勤 | 吴荣彬 | 戴建文 | 廖世邦 | 陈晓义 |
| 钟伯良 | 郭德昌 | 赵忠伦 | 李桂林 | 文士华 | 范启先 | 周正禄 |
| 刘世信 | 刘地义 | 孙志轩 | 秦永厚 | 杨仁俊 | 况平寿 | 夏祖国 |
| 钟龙廷 | 周良骥 | 陈文明 | 杨彦祥 | 杨甫朝 | 谭继超 | 周志禄 |
| 黄友效 | 李代发 | 胡光伦 | 赵远树 | 刘天怀 | 刘诗全 | 陈银安 |
| 邱运凡 | 陈万顺 | 戴绍华 | 杨惠民 | 李立寅 | 刘兴国 | 范一平 |
| 黄必达 | 胡天贵 | 黄德胜 | 秦朝陞 | 李廷培 | 李来江 | 毛金泉 |
| 胡观智 | 胡水兰 | 苏可畏 | 周绍楷 | 熊朝付 | 邓金辉 | 张世炳 |
| 邓恩富 | 阙松林 | 邓万远 | 何渠 | 秦永全 | 邓少云 | 蔡业勤 |
| 彭道荣 | 罗华生 | 夏振国 | 郭学元 | 游举云 | 黄天翔 | 焦文俊 |

| | | | | | | |
|-----|-----|-----|-----|-----|-----|-----|
| 施正祥 | 李方中 | 陈德应 | 孟 滨 | 苟宗儒 | 刘文里 | 陈文仁 |
| 张学惠 | 熊远华 | 孙贵荣 | 何重道 | 冉瑞合 | 田良发 | 吴品杰 |
| 陈建明 | 杨家彬 | 左其昌 | 蹇光华 | 黎海云 | 何先梅 | 肖传禄 |
| 孟之江 | 戴中立 | 张泽普 | 刘琼芳 | 李刚毅 | 邓思凡 | 罗文湘 |
| 毛洪全 | 周少才 | 文森泉 | 李 平 | 周泽炳 | 高俊善 | 黄凤城 |
| 陈令先 | 杨仁孝 | 赵 森 | 杨永富 | 刘志岳 | 李世勤 | 胡正芝 |
| 汪君一 | 李安禄 | 何孝宣 | 汪银洲 | 白 华 | 刘维章 | 罗碧华 |
| 谭少明 | 平福生 | 晓 蒙 | 刘执中 | 刘剑辉 | 吴正良 | 张兴全 |
| 高福永 | 刘康侯 | 汤其书 | 甘在佑 | 甘培新 | 王席珍 | 孙凤章 |
| 孙文卿 | 刘小芳 | 李富森 | 蔡菲菲 | 姚祖君 | 何裕云 | 陈大富 |
| 陈伯生 | 张正立 | 姚秋平 | 陶光明 | 李雨村 | 裴志刚 | 张惠容 |
| 刘永德 | 张文举 | 李儒荣 | 吴裕民 | 王云孝 | 杜清超 | 胡德书 |
| 刘德贵 | 黄在芝 | 邹树德 | 肖玉华 | 夏海清 | 汪汉成 | 白光齐 |
| 申德冲 | 梁炳荣 | 彭玉铭 | 蒋志刚 | 孙桂华 | 方文博 | 周序峰 |
| 李凤怀 | 张友凡 | 曾祥泉 | 秦光斗 | 陈兴全 | 张学根 | 况道生 |
| 陈树荣 | 黄正学 | 刘勉力 | 陶永昌 | 郭中敏 | 石云华 | 陈邦杰 |
| 袁伯安 | 杨汉中 | 刘孝瑜 | 游长发 | 王莲方 | 邹先志 | 朱叔西 |
| 朱代珍 | 张 善 | 盛 伦 | 魏在德 | 刘天容 | 肖必成 | 周昌明 |
| 刘光中 | 陈庆富 | 蔡澄如 | 张德清 | 蒋学武 | 何心盛 | 毛庆国 |
| 王正华 | 甘伟禄 | 王方瑜 | 张思淑 | 李耀全 | 陈熙林 | 罗子先 |
| 陈南平 | 胡远富 | 况富云 | 郑金海 | 刘玉林 | 唐生玉 | 周锡平 |
| 李维钊 | 谭明华 | 黄乾华 | 李远明 | 黄云祥 | 唐武穆 | 陈在武 |
| 唐兴富 | 胡中华 | 陈均模 | 陈天富 | 陈德路 | 肖昌言 | 刘志明 |
| 李开云 | 王绍清 | 胡元泉 | 胡希文 | 蒋朝贤 | 李如章 | 周登高 |
| 李德云 | 易茂全 | 刘九富 | 文建龙 | 王方谷 | 张大贤 | 林伟益 |
| 解朝栋 | 刘其敏 | 邹龙江 | 夏泽民 | 赵志华 | 陈自然 | 潘传信 |
| 王家国 | 黎绍恒 | 李群林 | 张海云 | 汪道敏 | 钟泽民 | 苏茂华 |
| 王平治 | 王忠生 | 韩伯超 | 向东升 | 胡光忠 | 蒋培石 | 余新亚 |
| 朱兴国 | 刘俊卿 | 吴 瑜 | 高耀恒 | 胡正国 | 薛邦德 | 舒启志 |
| 吴邦云 | 黄金星 | 彭洪生 | 邹书弟 | 张兴国 | 余伯喜 | 黄德方 |
| 周兴民 | 李坤喜 | 郑成华 | 吴德一 | 刘兴朗 | 陆定明 | 何定安 |
| 夏德培 | 高道魁 | 张家鹏 | 黄海辉 | 蒋富森 | 文汝成 | 陈才用 |
| 周绍文 | 陈润民 | 岳治强 | 吴素华 | 刘伯良 | 董文良 | 苗培林 |
| 胡 棋 | 向 杰 | 陈文学 | 谭相国 | 王元培 | 孙长江 | 傅长寿 |

| | | | | | | |
|-----|-----|-----|-----|-----|-----|-----|
| 张乾生 | 蒋明共 | 戴海洲 | 刘应龙 | 傅兴义 | 陈秋涵 | 刘善武 |
| 易长江 | 李正全 | 林树谭 | 王文治 | 王振文 | 刘炳英 | 吴培良 |
| 荣福忠 | 陆明秋 | 黄廷佩 | 刘中田 | 张志立 | 舒朝濂 | 田宗煜 |
| 刘治华 | 龚 卫 | 许书南 | 邹福金 | 孙志芳 | 卞培成 | 周 闯 |
| 冯克仁 | 范正强 | 张书河 | 唐中于 | 孙洁宣 | 薛定华 | 夏中庸 |
| 杜绍珍 | 江述艺 | 吴安昌 | 罗继中 | 刘寿长 | 刘相国 | 刘万春 |
| 任伟平 | 何志国 | 刘玉兰 | 张洁泉 | 罗正友 | 朱自钊 | 冯义全 |
| 蔡金秀 | 刘长惠 | 吴银彬 | 袁质彬 | 谭实书 | 张德银 | 王立清 |
| 赵增武 | 傅胜云 | 谢风太 | 周兴明 | 刘崇定 | 王万昌 | 肖碧玉 |
| 潘世昌 | 卢正兴 | 丁志贤 | 夏先进 | 周显德 | 辛相池 | 郭兴华 |
| 吴树权 | 颜才元 | 庞贵华 | 席德坤 | 吴学良 | 李国民 | 张清秀 |
| 朱代明 | 陶代久 | 向国珍 | 曾继勤 | 袁生力 | 夏蔚金 | 陶 冶 |
| 张公正 | 秦素华 | 吕吉祥 | 苏洪康 | 何如明 | 禹贵明 | 李贤忠 |
| 朱兴斌 | 何在贵 | 周文星 | 况金树 | 彭洪明 | 王德贵 | 代 朋 |
| 罗绍云 | 李树林 | 陶生云 | 陈大忠 | 蔡顺清 | 黄福金 | 韩最金 |
| 李正才 | 张正国 | 蒋伦友 | 张成义 | 舒 益 | 张进强 | 张云鑫 |
| 黄扬孝 | 方泽惠 | 张书琴 | 张大明 | 文庆远 | 喻德贵 | 张先渡 |
| 郑锡生 | 韩道志 | 吴昌华 | 陈文才 | 徐永德 | 曹中信 | 尧伯顺 |
| 赵海龙 | 高士贵 | 李崇仁 | 秦惠菊 | 杨家声 | 袁兴胜 | 王 赫 |
| 朱正宣 | 袁仁勇 | 刘玉合 | 张信中 | 梁海彬 | 余永庆 | 李登全 |
| 苟顺章 | 周义普 | 范安治 | 余绍宇 | 陈兴文 | 李 明 | 严文龙 |
| 余沛林 | 蒋乃贵 | 余中林 | 杨昌生 | 夏启贵 | 阜锡位 | 马友维 |
| 陈洪华 | 张廷伟 | 田茂生 | 杜福膺 | 何沛涛 | 龚文才 | 洪世元 |
| 王小永 | 李代举 | 藺树全 | 王淑民 | 李代贞 | 另大明 | 张怀于 |
| 魏伯志 | 杨秀良 | 李世云 | 王连芳 | 张清贵 | 王守云 | 罗明亮 |
| 代美兴 | 李天祥 | 谭世忠 | 唐中生 | 夏定全 | 周焕章 | 周巨学 |
| 熊尚斌 | 张建林 | 杨成禄 | 李万喜 | 田仁生 | 彭志成 | 王忠道 |
| 王忠兴 | 毛克明 | 徐一谷 | 彭友林 | 彭友明 | 何应德 | 李同村 |
| 刘永金 | 严昌贵 | 张兴明 | 李仁朝 | 唐常太 | 陈龙庆 | 蔡世忠 |
| 夏永平 | 刘兴群 | 陈正一 | 赵洪远 | 田中云 | 彭玉波 | 杨华康 |
| 王秀理 | 向光琦 | 何可文 | 刘绍清 | 任泽忠 | 秦绍乐 | 夏顶华 |
| 王国祥 | 熊德全 | 冉兴明 | 赵世雄 | 刘志龙 | 陈朝林 | 李光全 |
| 薛高余 | 夏绍龙 | 殷藻平 | 徐大昌 | 傅耕耘 | 黄其勋 | 彭 昌 |
| 蔡维初 | 郭 云 | 余行泽 | 蒋光发 | 谭吉昌 | 况银刚 | 任治平 |

| | | | | | | |
|-----|-----|-----|-----|-----|-----|-----|
| 蔡克明 | 杨顺清 | 黄虎龙 | 夏德胜 | 任成华 | 黎昌明 | 朱长富 |
| 吴文孝 | 蔡邦海 | 吴朝进 | 况金全 | 董长均 | 袁永科 | 苏克贵 |
| 陶学渊 | 汤永腾 | 殷书贤 | 夏群英 | 李吉太 | 宋现尧 | 张尚弦 |
| 彭正模 | 余宏亮 | 赵治清 | 杜在同 | 杜在木 | 陈兴虎 | 潘银洲 |
| 傅明朗 | 谭启清 | 彭庆禄 | 何朝枢 | 王世行 | 王朝奉 | 刘仁俊 |
| 陈明亮 | 刘顺清 | 张若愚 | 刘福生 | 黄正乾 | 王天武 | 徐元堂 |
| 李发明 | 舒榜发 | 况能明 | 李国凡 | 王秀海 | 罗永清 | 舒朝明 |
| 李朝明 | 袁志权 | 钟世昌 | 潘本科 | 杨星元 | 孙才模 | 向志仁 |
| 张友胜 | 袁普华 | 孙桂勋 | 谢克加 | 盛久合 | 朱传喜 | 盛久远 |
| 冯国民 | 田应木 | 潘永国 | 潘仁美 | 何顺发 | 何占国 | 何登科 |
| 何登明 | 唐桂生 | 窦加兰 | 蒋良芬 | 王兴民 | 何占旭 | 邓金权 |
| 刘继忠 | 孙贵昌 | 曹德银 | 李福顺 | 代富伦 | 刘茂伯 | 刘炎强 |
| 黄正五 | 秦炳祥 | 牟宗贵 | 钟仕隆 | 童作文 | 向正刚 | 袁恩伦 |
| 周淑均 | 余昌国 | 黄慎辉 | 李旭丰 | 李玉锡 | 钟维明 | 谭贤辅 |
| 薛家齐 | | | | | | |

在“二月镇反运动”中所整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材料及“罪状”、“罪证”、“传单”、“漫画”、“画片”、“画册”、“图片”等均属黑材料，一律作废，全部焚毁。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隐藏、转移、复制、传播。

当前，涪陵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决心同涪陵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发展和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共同战斗。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全盘否定“二月镇反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海泛舟】

军队严厉打击造反派组织

（《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选读）

叶曙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叶曙明著《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一书（自印书）第五章“军管广州”的第五节。此节之前写到：因广州军区军内造反派与军区领导的尖锐冲突，引来地方造反派省革联旗下的许多组织声援军内造反派，发生围攻、冲击军区的“二八”事件，中央军委在三个小时内连下两道命令，要求造反派自觉维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省革联一派被迫退却。军区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一些群众组织纷纷退出省革联，省革联被迫进行了跨台前的改组……

省革联垮台以后，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3月1日凌晨4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然的行动，按预定计划，一举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原计划拘捕130名首要分子，实际拘捕243名，其中有些是其他组织抓来，或自动投案的。该组织七名常委中，有五人被捕。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除了因为它参与了一系列冲击军区的行动外，主要是依据去年12月3日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12月1日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指出：“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而八一战斗兵团既犯了不准成立跨行业组织的天条，也犯了不准转业、复员军人成立组织的天条，加上内部还有假的转业、复员军人，三罪并发，绝不留情。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方式，与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相类似，按广州铁路公安处广州分处的一份文件规定：

凡中队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联络员以上骨干，罪恶民愤较大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的各种分子，参加后又有破坏活动，虽不是大队长以上骨干，但有严重罪恶的，都要依法惩办。

凡中队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联络员及独立单位骨干，虽非骨干，但有一般罪恶行为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各种人，这些人要向当地公安所或本单位保卫科履行登记手续。并公开检讨，声明退出反动组织，接受批判。

一般成员不履行登记手续，但要向所属单位或街道以大字报形式公开声明退出反动组织，即不予追究。

在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3月4日，省广播电台院内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宣读布告：“勒令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所有成员，下午三点到礼堂开会，不得有误，如有违抗，后果自负！”当天下午，全台召开了“揭发控诉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及其首恶分子罪行大会”。这两个组织的五名成员被拘留。

在主义兵砸珠影东方红的翌日，军队也采取行动了。3月3日至6日，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

3月4日清晨4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15名干警，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厂等几个厂的民兵800多人，包围了珠江电影制片厂珠影东方红。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6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散会后把被捕的人带走，民兵、部队撤回，行动在7时30分结束。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3月5日上午9时，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罪名不一而足。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但八三一并没有解散。黄意坚、陈家吉在北京接到广州电话，得知军队开始取缔造反派组织了，“武传斌要准备去坐监了”，八三一等不及黄意坚回来，便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黄意坚担任八三一的勤务组组长，接替武传斌为总指挥。黄意坚从北京赶回广州后，立即着手整顿组织，“八三一在三·五命令之前是60多人，三·五命令之后，八三一召集人员，个个来申请，重新登记，有200多人。很多以前参加八三一活动，但并没有参加八三一的，（现在）你说是反革命，我就来参加。”（访问黄意坚谈话记录。2003年2月23日）八三一的队伍反而扩张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捕，据千钧棒成员自称：“3月16日警备司令部宣布‘千钧棒’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五个‘首恶分子’后，我们剩下的六个同志，在全团群众中成了唯一的‘劳改犯’，每天上午劳动一小时，其他时间是写检查，交代‘首恶分子与自己的罪行’，劳改的内容是：打扫院子、厕所，有的是团内派公差与团内的黑帮到外面扛木头。”（《千钧棒战士给周总理的信》，载新一司编《红旗》第十一期，1967年8月29日）

与此同时，军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纷纷奔赴各单位，演说、宣讲、做报告，批判省革联是“右派夺权”、“假夺权，真保皇”。